



向學作
列習方
寧工法

著 姬卡斯普魯克
行 印店書北東

克魯普斯卡婭著

向列寧學習工作方法

東北書店印行

向列寧學習工作方法 1948.10.再版

著 者 克 魯 普 斯 卡 姆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哈 爾 濱 道 裏 地 段 街 五 十 一 號

分 店 齊 齊 哈 爾 吉 林 牡 丹 江 赤 峰 梅 河 口 通 化

佳 木 斯 安 東 鄭 家 屯 北 安 白 城 子 熱 東

哈。5001—10000。

序言

1

列寧於四十年前，一八九四年，在其秘密出版的第一部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中，對那些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當作行動指南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應沿何種軌道進行工作的問題有過極大的注意。依里奇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引證了李卜克內西的話，說馬克思主義者應孜孜不倦地研究，宣傳和組織：「而當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歸結於要成爲無產階級思想領導者，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實在鬭爭，以反對那些橫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底實在道路上的實在真正敵人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條件下，理論工作和實際工作就溶合爲一個工作，這個工作會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老戰士李卜克內西很中肯地估計爲如下三字：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研究，宣傳，組織）。除非有上述理論工作，就不能成爲思想領導者，同樣，除非按事業需求來進行這個工作，除非在工人中間宣傳這個理論底結果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也一樣不可成爲思想領導者」（『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一九二頁）。

依里奇把馬、恩底同胞，並在他們領導下工作的這位德國老共產主義者的這一指示，作爲自己全部革命活動底基礎。「列寧全集」就使我們有可能去考查列寧在上述每一領域內所做過的巨大工作，

研究他的工作方法，考究這些方法的效用性。每個黨員，每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每個蘇維埃工作人員，不管他是在那一領域工作，都須得詳細地來研究列寧的工作方法；這一研究就會武裝他，幫助他提高自己的工作質量，提高他在其中工作的那一組織底工作質量。

列寧工作方法上的遺產，還沒有澈底加以研究。在這方面作得最多的是斯大林同志，他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問題」的講演內，闡明了列寧工作方法底實質。某些與列寧一塊工作過和學習過列寧工作方法的同志，他們在其回憶中提供了燦爛說明列寧工作方法的許多細節，使我們能從中汲取很多的知識。自然，回憶列寧時，他們是不能不講到列寧的工作的。每個人都各按其黨的和生活的經驗，按其工作性質和個性來回憶了在依里奇工作風度中的細微特徵。總括地說來，這些回憶對闡明列寧如何工作的問題，曾給了極多的材料。就拿彼得沃義斯基，克爾什熱諾夫斯基，盧那察爾斯基，葉墨爾楊諾夫等同志的回憶來說吧，其中每個回憶都提供了極多的材料。

我們研究列寧底工作方法，就能更好的來瞭解列寧及其工作底規模，我們就學習更好的來瞭解工人階級及其黨所經歷的道路，就能更好的來瞭解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列寧在其工作中始終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為指南的：他在觀察現象時是從現象的全部總和，它們的一切聯系和因果關係來觀察的，是從它們的發展，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必需的觀點上來觀察的，所以他研究一種問題是把這問題與宣傳和鼓動問題——即把獲得的知識轉交羣衆——與組織問題緊相錯綜着的。理論與實踐的這種聯系是向着一定的軌道發展，而研究現象的事宜就使這一研究成爲特別有生氣的，它不僅改變了全部宣傳工作和鼓動工作的範圍，而且也改變了全部宣傳工作和鼓動工

作的性質。

極仔細地去考察列寧在其活動底各個不同階段上之科學、宣傳、鼓動和組織諸工作間的相互聯系，考察這個相互聯繫如何成爲日益深刻的和活生生的，這點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列寧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的種種問題的迫切性，對每一問題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深刻分析問題，對工作之科學的誠實性和精密性，把理論與實踐緊密聯繫起來，把理論與勞動羣衆日常鬭爭緊密聯繫起來，以生活和實踐來檢查理論——這是列寧之爲科學工作人員底特徵。

深刻瞭解工人羣衆和農民，善於把握住當時使他們奮激的問題，由於有這種瞭解而善於接近羣衆，引起他們注意，使他們悅服，吸引他們積極參加鬭爭——這是列寧之爲宣傳者和鼓動者底特徵。把理論與宣傳工作緊密聯繫起來，對造謠惑衆者的憎惡，與庸俗化作鬭爭，善於通俗地解釋各種最困難的問題，說明問題的實質，並指出應如何把理論應用於實際，最深刻的信心，所有這些我們都可在宣傳者和鼓動者的列寧那裏去找到。

研究國際工人運動面前的任務，研究該時代底具體條件和革命動力，研究自己國家發展底具體條件，研究每一民族，每一階層底利益，研究每一階層底生活、工作和自覺底條件，明白地瞭解爲要達到所提出的目的，目前須得作什麼和怎樣去作，知道人物，這就使列寧成爲工人階級鬭爭底組織者、黨底組織者，工人階級勝利底組織者，蘇維埃政權底組織者，社會主義建設底組織者。

爲要研究列寧活動的各方面，還需得做一番集體的巨大科學工作。

本集是近十年來寫作的一些文章的彙集，目的是在於闡明列寧活動的各方面。這不過是尙待完成

的工作的極小部份。

納·克魯普斯卡婭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目次

| | |
|---|------|
| 序言..... | (一) |
| 列寧的科學工作方法問題..... | (一) |
| 列寧是怎樣研究馬克思著作的..... | (六) |
| 列寧是個宣傳家和鼓動家..... | (二三) |
| 列寧是黨刊物底編輯者和組織者..... | (四三) |
| (一) 公開刊物和秘密刊物..... | (四三) |
| (二) 只有原則上和諧一致與切實工作的編輯部才能把報紙工作 提到應有的高度..... | (五一) |
| (三) 編輯者列寧底工作..... | (五五) |
| (四) 列寧與『真理報』..... | (六七) |
| 工人刊物底組織作用..... | (七五) |
| 列寧論善於寫工農羣衆讀物的技能..... | (八四) |
| 怎樣來寫羣衆讀的黨的書籍..... | (九二) |



| | |
|--|-------|
| 在全蘇聯工農通訊員會議上的報告..... | (九六) |
| 羣衆監督與工人通訊員..... | (九九) |
| 我們要向依里奇學習..... | (一〇三) |
| 培養列寧主義者（在蘇俄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辭）..... | (一〇六) |
| 如何研究列寧主義..... | (一一一) |
| (一) 要教人瞭解列寧主義底實質..... | (一一一) |
| (二) 必須認真地來研究馬克思主義..... | (一一一) |
| (三) 研究列寧主義應從何着手呢？..... | (一一二) |
| (四) 要估計到需求..... | (一一三) |
| (五) 要在具體情況中來觀察現象..... | (一一三) |
| (六) 要仔細地研究現實..... | (一一五) |

列寧的科學工作方法問題

列寧不管做什麼工作，他都是極仔細地來做。他親自做過很多的準備工作。他對某種工作愈認為重要，他就愈加深入到這工作的各種細節中去。

列寧一方面看到，九十年代末在俄國組織經常出版的秘密報紙是多麼困難的事，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闡明一切事變，闡明俄國現實生活底一切事實，闡明已開始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的全俄報紙，在組織和宣傳方面都有巨大的意義，所以他選好一批同志後，就決定出國，在那裏出版這樣的報紙。「火星報」就是他所思索出來和組織起來的。每期都經過了精心的推敲。每句話都再三地思維過。弗拉基米爾·依里奇親自作過整個報紙的校對工作，這就是最標本的一個細節。他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校對無人（我很快就學會了這種工作），而是因為他關心工作，害怕弄出甚麼錯誤來。首先他親自校閱一遍，然後交給給我，以後他又親自審查一遍。

對一切工作都是如此。他對地方自治局統計材料的研究及整理作過很多的工作。在他筆記簿裏仔細地寫了很多的統計表。當涉及有巨大意義和巨大比重的數字時，他連已公佈的數字表的總計也加以檢查。仔細地檢查每一事實，每一數字，是他始終用的方法。他的結論都是根據事實來作的。

每個結論都以事實為根據的意向，在其早年著作：「論罰款」，「論罷工」，「新工廠法」等章

傳小冊子中，表現得最爲明顯了。他一點也不相強工人，他總是以事實來作證明。有人以爲，這些小冊子未免過於冗長。但工人們却以爲這些小冊子特別具有說服能力。列寧在獄中寫的基本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包含有巨量的實際材料。在列寧的生活中對馬克思「資本論」的閱讀竟起了巨大的作用，他記得，馬克思自己的結論是基於何等大量的實際材料。

列寧並不靠自己的記憶，雖然他的記憶是很好的。他從不憑記憶「大致不差地」來敘述事實，他敘述事實是極確切的。他閱讀了極多的材料（他讀書，也像他寫作一樣，都是很快的），想要記着的地方，他都寫上了筆記。在他的筆記簿上保存有很多的摘錄。有次，他翻閱我寫的那本名爲「怎樣組織自修工作」的小冊子說，我以爲只須記錄最必需的材料的意思是不正確的，他有另一種經驗。所記錄的東西，後來他都反覆地閱讀過，這從他所標記的那些符號和着重號等等中可以看出來。

如果書是他自己的，那他就只限於打着重號，做頁邊評註，在封面上就只記下頁數，看標記地方之重要程度，以畫一條線或幾條線來着重它。他也反覆地閱讀自己的文章，也在它上面加些評註，如遇到有引起什麼新思想的地方，他也打出着重號來，並在封面上記下其頁數。依里奇就是這樣的來組織自己的記憶的。他常清楚地記得，他說過什麼，在什麼情形下，並是同誰爭論時說的。在他的著作、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很少看到重複的地方。誠然，我們在多年當中，在依里奇的文章和講演裏，也會遇到同樣的基本思想。所以在他的言論中烙得有某種特別完整和特別穩固底印跡。然而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簡單地重複他先前所講的東西。而是針對着新的條件，在另一具體情況來應用同樣的基本思想，從新的方面來闡明問題。我記得與依里奇有一次談話。當時他已在病中了。我們談到了剛出版

的幾卷「列寧全集」，談到了在各卷中怎樣反映了俄國革命經驗，使外國同志領會這個經驗是多麼重要的一回事；談到要利用自己出版的各卷來指明出基本的中心思想，如何必不可免地應隨具體歷史環境的變更而作各種不同的解釋。依里奇囑我去找個能執行這一工作的同志。

然而，這件事情直到現在還沒有作。

列寧仔細地研究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底經驗。這一經驗在馬、恩著作中特別明顯地闡明過。列寧會再三再四地閱讀過這些著作，在我們革命的每一新階段上反覆又反覆地來閱讀這些著作。大家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列寧有多麼巨大的影響。但重要的是來看看，列寧在估計我國革命每一階段上的當前情況和發展前途時，研究他們的著作得到了些什麼幫助並怎樣的幫助了他。這樣的調查研究作品還沒有寫就，而它是會極顯明地揭露出，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如何幫助了列寧底預見才能。這樣的作品，是會給注意列寧工作方法和閱讀馬、恩著作方法以及列寧在估計我們鬥爭時從馬、恩著作中拿了些什麼來作指南的人們以豐富的知識。這樣的著作會指明，工業方面最先進國家工人階級底革命鬥爭經驗，對我國革命，對我國整個革命運動有多麼巨大的影響。這樣的作品會使人更好地來感覺：俄國革命，整個我們的鬥爭和建設，是世界無產階級鬥爭底一部份。這樣的作品會指明，列寧從無產階級國際鬥爭底經驗中拿來了些什麼，並且是怎樣拿來的，他又如何應用了這一經驗。這是要特別向列寧學習的。

列寧極熱情地研究了國際無產階級鬥爭底經驗。是再難想像一個比列寧更爲「反對博物館」的人的。博物館材料之龐雜無章常使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發生一種極苦惱的印象，十來分鐘後他就顯現出

極爲疲勞的樣子。但有次參觀一個展覽會却使我牢記在心了。在巴黎一個歷史上以其革命鬪爭聞名的工人區域裏的兩間小屋內，組織了個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展覽。這裏就可以看到，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是帶着何等深刻的興趣目不轉睛地來注視其每一細節啊。在他看來這是活的鬪爭底一部份。當我來到我們的「革命博物館」時，那個聚精會神地來注視每一細節的依里奇的英姿就呈現於我的眼前了。

應如何利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鬪爭經驗，關於這點依里奇自己曾寫過多次。我記起了有次他發表的意見。考茨基關於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寫了一本「俄國革命動力與前途」的小冊子。依里奇很喜歡這本小冊子。他叫趕快把它翻譯出來，他仔細修改後，就寫了一篇熱烈的序言，叫我設法使這本小冊子能很快地出版，並擔任起全部的校對工作。我記得，我們那個巨大的公開印刷所在三天內還不能排好這本小冊子的情形，只好三天三夜不出印刷所門一步的坐在那裏，一連幾點鐘的等着校對。依里奇真會以其熱忱來燃燬周圍的人們。當他敘述了那些因考茨基所著的小冊子所引起的全部思想，並寫好了序言以後，當這本小冊子還未出版之前，顯然，就只好拋棄一切旁的工作坐在印刷所裏。直到現在，二十多年後，在我的記憶中還很奇怪地聯串得有：灰色封面，鉛字的模樣，以及在我們當時俄國技術上雜亂無章的痛苦中產生出來的小冊子之印刷上的錯誤，依里奇的熱烈言詞及其對於這一小冊子序言的結束語：「在結論中，關於「威信」的問題，須得來講幾句話。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站在激進派知識分子的那種平俗觀點上帶起似乎是革命的抽象態度，即認爲「不需任何威信」的態度。

決不是。在世界各國爲自己的完全解放而進行着艱苦頑強鬪爭的工人階級，是需要威信的，——

不過，威信的意義當然只在於青年工人是需要那反對壓迫和剝削的老戰士底經驗，需要那進行許多罷工，參加多次革命，具有革命傳統和廣闊政治眼界之老戰士的經驗。無產階級全世界鬪爭底威信對各國無產者都是需要的。全世界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底威信，是我們爲了瞭解我們黨綱領和策略所必需的。可是，這個威信與資產階級科學和警察政策之官場式的威信，當然是毫無任何共同之點的。這個威信是全世界社會主義軍隊的隊伍本身中多方面鬪爭底威信」，（『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二三〇至二三二頁）。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對『俄國革命動力和前途』一書的序言中寫到考茨基正確估計俄國革命說：『我們是站在完全新的局勢和新的任務之前，對這些新的局勢和新的任務一個舊的成規也不去採用，我們瞭解這點就好了』。依里奇在其序言中決然反對對新局勢去運用舊成規。我們知道，考茨基在估計帝國主義戰爭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就是因爲不會瞭解新局勢和新任務，而成了叛徒。

善於依據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鬪爭經驗來研究新的局勢和新的任務，善於應用馬克思方法來分析新的具體局勢，這就是列寧主義底特點。

列寧是怎樣研究馬克思著作的

俄國的工人運動因我國工業落後，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發展，當時在其他許多國家裏已廣泛地開展着工人階級底革命鬪爭，已有法國大革命底經驗，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以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國際工人運動的偉大革命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革命鬪爭的火焰中鍛鍊出來了。馬克思底學說指明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指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崩潰底不可避免，及其必然爲共產主義社會所替代，指明了新的社會形式發展底道路，即階級鬪爭底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底道路，闡明了無產階級在這個鬪爭中的作用及其勝利的必然性。

我們的工人運動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發展起來的，它不是盲目前進，而是有明顯的目的和道路的。

列寧在以馬克思主義底光芒來照耀俄國無產階級鬪爭道路的事業上作了極多的工作。馬克思逝世以來已五十年了，但馬克思主義仍繼續是我們黨的行動指南。列寧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底加深。

因此，來闡明列寧怎樣研究了馬克思著作這問題當然有很大的興趣。

列寧很知道馬克思的著作。當他於一八九三年來到彼得堡時，他就以博覽馬、恩著作，而使當時

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我們驚奇了。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小組才開始組織時，人們所研究過的主要是「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一書雖不易覺得，但終究還能找得到。至於馬克思的其他著作，情形却就完全不同了。大多數的組員連「共產黨宣言」也沒有讀過。例如，我自己只是在一八九八年放逐期間，才第一次讀到了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

馬、恩的著作是嚴格禁止的。只須指出，一八九七年，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爲「新言論」雜誌（註）寫作的那篇標題爲「論對於經濟浪漫主義的批評」一文中，爲了不給該雜誌討麻煩，竟不得不拒絕使用「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等字，而使用警喻來論列馬克思，這就足以證明了。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知道，並努力搜獲馬克思、恩格斯底德文版和法文版著作中所能得到的一切作品。列寧的姊姊安娜講過列寧同他的妹妹阿里加共同閱讀法文版「哲學底貧困」這一著作的情形。他所唸的大部分是德文版。他把馬、恩著作中最重要、他認爲最有興趣的地方，都給自己譯成了俄文。

在一八九四年秘密出版的列寧底第一部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中，曾從「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評」、「哲學底貧困」、「德國思想體系」、

（註）「新言論」雜誌，從一八九七年四月出版的那期起，就落到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克魯普斯卡婭註。

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寫給盧格的信、恩格斯底「反杜林」及「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起源」等著作中援引了論證。

「人民之友」這一著作。大大地擴張了當時還很少知道馬克思著作之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底馬克思主義的眼界，並按新的方式闡明了許多問題，且大受讀者的歡迎。

在列寧下一部著作，即「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所著一書內受到的批評」中，我們就已看到引證「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評」，以及「資本論」卷二、卷三等著作了。

後來僑居國外的生活，使列寧有可能來認識馬、恩的全部著作，並加以研究。

列寧於一九一四年替格蘭納特「百科辭典」寫的馬克思傳，是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依里奇精通馬克思著作的情形。

列寧閱讀馬克思著作時，所經常記錄下來的無數摘錄，也說明這點。在馬、恩、列寧學院中保存有他從馬克思著作中摘錄下來的很多筆記。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曾在自己工作中利用這些摘錄，反覆地閱讀過並寫了自己的評語。可是列寧不僅知道馬克思而且還深刻地思索了他的全部學說。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一九二〇年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大會上發言時，曾向青年們說，要善於「把所有一切人類知識攫為己有，並且在採取這些知識時須要做到使你所得到的共產主義不會是什麼熟讀死記得來的東西，而是你們自己所深思過的和從現代學問眼光看來是必然的結論」（「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卷，第四〇八頁）。

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想依據他所學得的現成結論來以共產主義自誇，而不去作最嚴重的、最困難的和巨大的工作，不去分解他所必須用批評精神看待的實際，那末，這樣的共產主義者就是很可悲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卷，第四〇七頁）。

列寧不僅研究馬克思所寫的一切著作，而且還研究資產階級營壘中他的敵人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寫的一切著作。他在於這些敵人論戰中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原理。

他在其第一部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對「俄國財富」（註）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者論文的回答）一書中，曾把馬克思底觀點來與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克里元科，尤沙可夫）底觀點相對立。

列寧在其所著「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所著一書內受到的批評」一文中指出了，司徒盧威觀點與馬克思觀點間的根本區別究竟何在。

他研究土地問題時，曾寫出了「土地問題和馬克思底「批評者」」這一著作（『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一七五頁）。那裏，他把馬克思底觀點去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達維德，格爾茨，以及俄國批評家——切爾諾夫，布爾加可夫等人底小資產階級觀點對立起來。法國有一句成語說……*Du choc des opinions jaillit la verite*」（真理是從各種意見的衝突中得來的）。

（註）俄國財富是一種月刊，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轉到了民粹派手裏，並成爲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鬭爭的主要刊物。——克魯普斯卡婭註。

依里奇很愛引用這句成說。依里奇經常把對工人運動基本問題上的各階級觀點揭露出來和對立起來。

列寧把各種不同觀點拿來對立比較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

『列寧文存』卷十九，就是說明這點的，該卷會將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前時期中，對土地問題所作的摘錄，概要，報告大綱等材料都收集進去了。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把『批評家』底意見仔細地作成了概要，選擇和摘錄其中一切最顯明、最突出的地方，並將馬克思底言論與之對立起來。他仔細分析『批評家』底言論，特別着重指出那些最關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並力圖揭露其階級實質。

列寧常常故意地來強調某個問題。他認為，聲調並不是最重要的事：聲調上是可以說得很粗暴又可以說得很嚴峻，只是要說出問題的實質。他在其所著『左爾格書信集序言』中引證梅林格底話時寫道：『梅林格在他的『左爾格書信集』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得『客氣』，這是說得對的：他們每次打人都不是躊躇的，但他們每次挨打，也不會抱頭啜泣。』（『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七二頁。）列寧也具有嚴峻的工作體裁，這是他從馬克思那裏學來的。他曾指出：『馬克思敘述說，他與恩格斯是經常反對這個『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的『可憐』（*misérable*）辦法的，而且常常是鬭爭得很厲害（*wobeis oft schar hergent*）。』（『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七〇頁）。依里奇並不害怕嚴峻，但他却要求一切反駁都是要按問題的實質。

依里奇常愛使用『吹毛求疵主義』這一字眼。如果爭論不是按問題的實質，而是歪曲事實和對細

小事故吹毛求疵，那他就說：「這已是「吹毛求疵主義」了」。

列寧還更嚴厲地來反對那種不以說明問題，而以開小派別鬭爭爲目的的論戰。這是孟塞維克常愛使用的方法。他們把那些從馬、恩著作裏割裂出來的片斷，與說這些話時的環境不相聯繫的論證來作掩蓋，其唯一目的是從事派別鬭爭。列寧在其「左爾格書信集序言」中寫道：「以爲馬、恩對英美工人運動的這些忠告是可以簡單地、不變地應用於俄國條件下，這就是不是爲了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是爲了研究在一定國家內工人運動的具體歷史特點，來運用馬克思主義，而是爲了開小派別和知識份子的意氣鬭爭來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七四頁）。

這裏我們就完全接近到列寧怎樣研究馬克思著作的問題了。這部分地是可以從上面這個引證中看得出來的：要了解馬克思底方法，向馬克思學習研究在一定國家內工人運動底特點。列寧會是這樣做的。在列寧看來，馬克思的學說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有次無意說出了這樣的語句：「誰願意請教馬克思：」。這句話是非常中肯的。他自己經常是「請教」馬克思的。在革命最困難的轉變關頭，他又重新反覆地來閱讀馬克思書籍。我有時到他辦公室去：一看大家都很興奮激昂，但依里奇却在閱讀馬克思底著作，而且難於脫離它。列寧之醉心於馬克思的著作，並不是爲的要安靜心性，並不是爲的要堅信工人階級力量，堅信它的最終勝利——這樣的信心依里奇是充分的，而是爲的要「請教」馬克思，以便從他那裏找到對工人運動最迫切問題的回答。列寧在「梅林格論第二屆杜馬」一文中寫道：「這般人們的論據是基於錯誤引證：他們採納關於贊助大資產階級去反對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一般原理時，不加以批評就把這些原理應用於俄國立憲民主黨，應用於俄國革命。」

梅林格給了這般人很好的教訓。關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任務問題，誰願意請教馬克思（着重點是我所加。——克魯普斯卡婭註。），誰就應當採納馬克思直接關係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那些議論。而我們的孟塞維克之畏縮地迴避這些議論，就不是偶然的了！在這些議論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爲反對妥協的資產階級所進行的無情鬭爭之最完滿最明顯的表現」（『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七六頁）。

將馬克思專門研究類似局勢的著作，仔細地加以分析，與當時的情況相比較，找出其中的異同之點來——這就是列寧底方法。把這種方法應用於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情形，是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依里奇的這種方法。

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內寫道：

「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了最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其他那一國無產階級底一切最近的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打破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而且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打破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我們知道，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鬭爭，提高了俄國工人階級的國際作用，一九一七年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真正把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但這只是在『做什麼？』一書寫出十五年之後才發生的。當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在冬宮廣場上槍殺工人後，革命浪潮高漲起來的時候，黨應領導羣衆走的方向，擬定它應採取的策略問題，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來了。於是列寧又請教馬克思。

他特別細心地研究馬克思關於一八四八年法國和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一切著作：『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法國的階級鬥爭』，以及由梅林格編印的有關德國革命的『馬、恩遺著』第三卷。

依里奇於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間寫作了『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在這部著作裏，他把布爾塞維克之趨向於號召工人羣衆去與專制制度進行最堅決的、毫不調和的鬥爭，直到武裝起義爲止的策略來同孟塞維克之趨向於號召與自由資產階級進行妥協的策略對立起來。列寧在『兩個策略』中寫道：『必須消滅沙皇制度。代表會議（新火星派的——克魯普斯卡婭註）也是忘記了，當政權還保留在沙皇手中時，無論什麼代表們底任何決定，都會如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國會底「決定」一樣成爲無謂而可憐的空話。革命無產階級代表馬克思當時在其「新萊茵報」上之所以如此無情地譏笑那些法蘭克福自由主義「解放派」，也恰巧就是因爲他們說了一些好聽的言辭，通過了種種民主主義的「決定」，「立了」種種自由，而在事實上却把政權留在國王手中，却沒有組織武裝鬥爭去反對當時握在國王手中的武力。而當法蘭克福的解放派還在那裏從事空談時，——國王却已等得了良機——鞏固了自己的武力，而反革命既憑藉着實在力量，就把民主派及一切美妙的「決議」打得粉碎了』（『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四四頁）

於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就提出這樣的問題說，資產階級能否用其與沙皇制度妥協介贖的方法來破壞俄國革命，或者是——如馬克思說過的一樣——能否用『平民手段』來打破沙皇制度。『如果革命達到澈底勝利，——那時我們就能用雅可賓派的手段，或者說用平民手段來打破沙皇制度』。馬克

恩於一八四八年有名的『新萊茵報』上寫道：『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不過是用來打破資產階級底敵人。即打破專制制度，打破封建制度，打破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手段罷了（見 Marx, Nachlass, (註)，由梅林格編印，第三卷，第二一一頁)。那些在民主革命時代把「雅可賓主義」當作嚇人字眼來恐嚇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的人們，是否思索過馬克思這幾句話底意思呢？』（『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六四頁）。

孟塞維克說，他們的策略就是『仍然爲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黨』，說這並不是說不宜於在某一個城市裏，局部地暫時地奪取政權並成立革命公社。『何謂「革命公社」呢？』……——列寧這樣提出問題並回答說：『他們（新火星派份子——克魯普斯卡婭註）由於自己的革命觀念糊塗不清，就——這是很常見的事——來說革命的空話。是的，在社會民主黨代表底決議中使用「革命公社」的字眼，就不過是一句革命的空話罷了。馬克思會屢次斥責這種用早已過時的「動心」名詞來遮蓋將來任務的空話。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動心名詞，在這樣的情形下就變成空洞而有害的裝飾品，變成爲玩意兒。我們必須給予工人們與全體人民以明確肯定而不容二解的觀念：爲什麼我們要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如果我們將對政權有決定影響，那末在已經開始的人民起義得到勝利結局時，我們究竟會立刻實現一些什麼改革呢？這就是政治領導者目前所應回答的問題』（『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八一頁）。

「這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人們，是從來也沒有思索過馬克思所說必須用武器底批評來代替批評底武器一語的。他們徒然接受馬克思底名字，而在事實上，他們是完全按法蘭克福資產階級空談家們底精神來擬製策略決議的，這些資產階級空談家會自由批評專制制度，會加深民主主義意識，殊不知革命時期是動作時期，是要既從上面動作，又從下面動作的時期」（『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九二頁』）。

「革命是歷史底車頭，——馬克思曾這樣說過」（『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〇四頁』）。列寧就用馬克思這句話做根據來估計正在熾烈的革命底作用。

列寧往下分析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的言論時，解釋道，什麼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可是列寧在進行比擬時也講到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間的區別問題。他寫道：「由此可見，只有在一八四九年四月，當革命報紙幾乎已出版一年以後（『新萊茵報』是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開始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表示出要成立專門的工人組織！在此以前，他們會僅僅編輯『民主派底機關報』，這幾關報是和獨立工人政黨沒有任何組織聯系的！這件事實，——從我們現代觀點看來，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和不可思議的事實，——就向我們顯然指明，在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現時俄國社會民主黨間該有如何巨大的區別。這件事實向我們指明，運動裏的無產階級特徵，運動裏的無產階級潮流，在德國民主革命中是會暴露得少過多少倍（由於德國在一八四八年的落後，既在經濟方面落後，又在政治方面落後——國家零亂而不統一）」（『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二四至一二五頁）。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那些寫於一九〇七年的文章，那些專門論列馬克思底各種通信及其活動的文章，是特別有意思的。

這就是：『馬克思致顧格爾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三六一至三六七頁），『梅林格論第二屆杜馬』（『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七二至七七頁）以及『左爾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六五至一七九頁）。這些文章特別詳盡地闡明了列寧研究馬克思著作的方法問題。有趣的是其中最後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列寧因與波格丹諾夫發生意見分歧而重新努力研究哲學，以及當辯證唯物主義問題成爲其特別注意中心時所寫的。

列寧既研究馬克思關於類似我國因革命失敗而發生的問題的意見，同時又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問題，向馬克思學習如何應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去研究歷史的發展。他在『左爾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中寫道：『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英、美和德國工人運動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加以比較，是很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德國在一方面，英、美在另一方面是代表着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同階段，是代表着資產階級這一階級在這些國家全部政治生活中之不同的統治形式，那末上述的比較，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從科學的立場說來，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唯物辯證法底榜樣，看到了善於依照不同的政治、經濟狀況底具體特點提到頭等地位並着重指出問題底不同之點和不同方面的本領。從工黨底實際政策和策略的立場說來，我們在這裏就看到了『共產黨宣言』底作者如何依照各國工人運動底不同階段來規定戰鬥無產階級任務底榜樣』（『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六六頁）。

一九〇五年革命提出了許多新的迫切問題，列寧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又更深刻地來思索了馬克思底各種著作。在革命的火焰中鍛鍊了列寧研究馬克思學說的方法（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這種研究馬克思學說的方法給列寧以武器去與那曲解馬克思主義、和閹割其革命實質的現象作鬭爭。我們知道，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在組織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事業上，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這一著作完全是以深刻研究馬克思關於國家的革命學說為基礎的。

我們且把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的頭一頁引證於下吧：『馬克思底學說，在今日的遭遇，正和被壓迫階級解放鬭爭中的領袖和革命思想家底學說，在歷史上數見不鮮的遭遇一樣。大革命常常畢生受着壓迫階級的虐待；他們的學說常常引起了壓迫階級切骨的痛恨，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當他們死了之後，人們便企圖把他們奉為無害的神像，頌揚他們，相對地表彰他們的名字，來「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閹割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這個學說底革命鋒芒，使這個學說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是同樣用這種方法來「改作」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忘記着，拋棄着，曲解着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們把資產階級所能接收，或似乎可以接收的部份，提在第一位，而加以頌揚。所有社會沙文主義者，現時都儼然自號為「馬克思主義者」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今天却在談論「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了。說這個馬克思似乎爲了進行劫掠式的戰爭而訓育好了極有組織的工會！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首先便是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的學說』（『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一頁）。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列寧主義基礎」這一著作中寫道：「祇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時，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爲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鬭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表明自己時，祇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鬭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週到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那些曾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歪理的關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遂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着重點是我所加——克魯普斯卡婭註）。然而列寧並未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爲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爲領導無產階級鬭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系統」（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一年中文版，第五九至六〇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他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經常重複他們的這句話。他用來研究馬、恩著作的方法，革命的實踐，以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全部情況，幫助了列寧正是把馬克思底革命理論變爲真正的行動指南。

我來講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吧。不久以前我們慶祝了蘇維埃政權成立的十五週年紀念。我們就聯想起一九一七年十月組織奪取政權的情形。奪取政權並不是自發的，而是由列寧深思熟慮過，並以馬克思關於如何組織武裝起義的直接指示爲指南的。

十月革命把專政轉交無產階級手中後，鬭爭底全部條件就根本改變了；正因爲列寧不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字句爲指南，而是以其革命的內容爲指南，他才善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把馬克思主

我應用到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上來。

我只講到了幾點。還必須做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把列寧從馬克思那裏取得的一切選擇出來，查明他是怎樣取得的，在什麼時期取得的，並與革命運動底何種任務有關等問題加以論列。我連民族問題，帝國主義等這樣極重要的問題也沒有涉及。『列寧全集』和『列寧文存』之出版，使這一工作較前容易了。列寧從頭至尾在革命鬥爭的各階段上研究馬克思著作的道路，不僅幫助我們更好地、更深刻地瞭解馬克思，而且還幫助我們更好地、更深刻地瞭解列寧自己，瞭解他研究馬克思著作的方法和把馬克思學說實現到實際生活中去的方法。

還須指出列寧研究馬克思著作之具有重大意義的另一方面。列寧不僅研究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研究了他的『批評者』論列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他還研究了馬克思之走向某一觀點所經歷的道路，研究了那些啓發馬克思思想，並推動其思想走向某一定方向的著作。研究了，如果可以這樣說，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底來源，研究了馬克思怎樣從某一著作家那裏取得了材料並取得了些什麼樣的材料。他盡力深刻地去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底方法。一九二二年列寧在『論戰鬪性唯物主義底意義』一文中寫道，必須使『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底撰述者們從唯物主義觀點上進行有系統地來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的工作。他認為除非有堅固的哲學基礎，是抵擋不住資產階級觀念之猛攻和阻礙資產階級宇宙觀之復辟的。至於怎樣從唯物主義觀點上來研究黑格爾辯證法的問題，關於這點列寧曾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寫作過。現在我們就把列寧『論戰鬪性唯物主義底意義』一文底一段引證如下吧：

『……我們應當瞭解，任何的自然科學，任何的唯物主義，除非有堅固的哲學基礎，是抵擋不住

資產階級觀念之猛攻和阻礙資產階級宇宙觀之復辟的，在這個鬭爭中自然科學家爲要抵擋住敵人的進攻並取得最後的勝利，就必須做一個現代的唯物主義者，做一個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義底自覺的信徒，即是說，他必須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一雜誌底撰述者們，必須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上有系統地來組織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即是說，研究馬克思所實際應用於他的『資本論』及其歷史和政治等著作的辯證法……我們依據着馬克思把黑格爾辯證法用唯物觀點去理解的方法，就能够而且應當從各方面來研究這個辯證法，即在雜誌上去登載黑格爾的主要著作底摘錄，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上來解釋這個意見，以馬克思如何運用辯證法之實例，以及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領域內的辯證實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的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供給了許許多多這樣的實例——來做註釋，在我看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一雜誌底編輯者和撰述者們，應該成爲一種『黑格爾辯證法之唯物主義友人協會』。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在用唯物主義觀點去作解釋的黑格爾辯證法中，可以找到（如果他們知道如何去找）並且我們學會幫助他們去找）自然科學上革命所提出而使那些崇拜資產階級時髦思想的知識份子「陷入」反動的諸哲學問題之許多解答」（『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第一八七至一八八頁）。

『列寧文存』第九卷和第十二卷現已出版了，其中披露出列寧在研究黑格爾基本著作時的全部思維過程，披露出，他如何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去研究黑格爾作品，他如何把這一研究去與加深研究馬克思意見的工作緊密聯系起來，而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變爲行動的指南。

列寧不僅研究了黑格爾作品。有次他閱讀了馬克思於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致恩格斯的信，馬克思在這封信裏對拉薩爾所著名爲『葉費市出身綽號黑暗的赫拉克里特底哲學』一書（共二卷）給了嚴格的批評，把這部著作稱爲『門徒式的』著作。列寧起初把馬克思底批評歸納爲一簡略的定義說：『拉薩爾簡直是重複着黑格爾，抄襲他的意見，千百萬次地來咀嚼赫拉克里特底許多個別地方，給自己著作塞滿了多得不可思議的學者氣味和學究式的贅物』（『列寧文存』俄文版，第十二卷，第二九五頁）。但列寧終於來從事研究拉薩爾底這一著作，把它作成綱要，寫成摘錄，加上評語並在末尾做出總結說：『一般講來馬克思底批評是正確的。拉薩爾底這本書真值不得一讀的』（『列寧文存，俄文版，第十二卷，第三一七頁）。但是列寧自己研究這一著作的結果使他更爲深刻地瞭解了馬克思，瞭解了，他爲什麼這樣的不喜歡拉薩爾底這一著作。

末了，我還指出列寧對馬克思著作的另一工作形式——這就是他把馬克思學說通俗化。如果進行通俗化的人是『鄭重』其事，其目的是在拿出最簡單易懂的形式來說明某種理論底實質，那這一工作就會給他自己以極多的東西。

列寧以最嚴格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工作。他從放逐處寫信給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說：『我最願意的，是要學會寫工人讀物』。

他想把馬克思學說寫成工人羣衆親切易懂的東西。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他在工人小組中上課時，會力圖首先向大家解釋資本論第一卷，以組員們生活上的實例來解釋該卷所敘述的一些原理。一九一一年，列寧在龍壽姆（巴黎城郊）黨校培養去領導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的幹部時，他向工人們講授政

治經濟學，就力求簡易地來解說馬克思學說底基礎。依里奇在「真理報」上所發表的文章中，總是設法把馬克思學說的各部份盡量地通俗化。一九二一年關於職工會問題發生爭論時，列寧所說應如何應用辯證法來研究對象和現象，是通俗化底模範。列寧說：「爲要真正地認識一種對象，就要把握並研究其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因果關係』。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完全做到這點的，但要求全面觀察就可以免於錯誤，免於僵化。這是第一。第二，辯證邏輯要求在事物的發展，『自身運動』（如黑格爾有時所說的那樣）和變化中來觀察對象；第三，整個人類的實踐應當作爲真理底尺度，作爲事物與人類需要的聯系底實際標準而包括於事物底完全『定義』中去。第四，辯證邏輯教訓我們，——像已經去世的普列漢諾夫繼黑格爾之後所愛說的那樣，——『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這不多的幾行字，是列寧多年研究哲學問題，經常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經常「請教」馬克思所得的結晶。這幾行字以概要的形式來指明，在研究各種現象時所應作爲行動指南的要點。

列寧如何研究馬克思學說，也就教訓我們應該如何去研究列寧學說。列寧學說是與馬克思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它是實際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它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

列寧是個宣傳家和鼓動家

俄國工業較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德發展得晚一些。因此我國的工人運動也較之旁的國家發展得晚些——它只是在前世紀九十年代才成了帶羣衆性質的運動。此時國際無產階級已有了豐富的鬪爭經驗，已經歷過幾次革命，已在革命運動的火焰中鍛鍊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學說照耀着無產階級所應走的道路，他們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必遭死亡，無產階級不可避免要獲得勝利，奪取政權，並按新的方式來改造全部生活，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的社會。

列寧在青年時代認識了馬克思學說後，就深刻地加以思索，並瞭解到，這個學說是俄國工人階級的行動指南，它將幫助俄國工人從愚昧無知、橫遭虐待與備受剝削的奴隸境地中擺脫出來，而成爲爲社會主義鬪爭的自覺的有組織的戰士，它將幫助俄國工人階級長成爲強大的力量，將幫助它去領導全體勞動羣衆，並消滅任何的剝削制度。

馬克思底學說幫助列寧去明顯地看到社會發展的趨向。列寧熱烈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是正確的，並認爲必須儘量精彩，儘量廣泛地以馬克思學說底知識來武裝羣衆，於是列寧就以其全部的精力來宣傳這個學說。

馬克思主義基礎底宣傳在工人羣衆中有了很大的成效。列寧說，我們的宣傳工作之所以有這樣的

成效，並不是因為我們是很精巧的宣傳家，它之所以有成績，是因為我們所說的，都是真理。

具有深刻的信心，這就是列寧之為一個宣傳家的特點。

列寧很好地研究了馬克思的學說，馬克思的每一著作他都反覆地閱讀過。一九一四年他替格蘭納特『百科辭典』所寫的那篇論馬克思的文章，還提供了個極豐富的書目索引，這是最好不過地說明了列寧對馬克思學說的淵博知識。列寧的其他一切著作也說明了這點。

深刻地瞭解問題，是列寧之為一個宣傳家的第二個特點。

可是列寧不僅知道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而且還善於在一切聯繫中和因果關係中來把握這一理論。

他在一八九四年工人運動底初期，寫作『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時，就在這一著作中指明說，從工人運動開始發展時起，就應在我國的條件下來運用馬克思理論。這是當大多數革命家認為在俄國條件下工人階級是不能起多大作用時所寫的。

一八九九年，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一書出版了，在這一著作裏用大批的實際材料證明了，我國雖然落後，但資本主義仍在我們俄國發展起來。

一九〇二年列寧出版了『做什麼？』一書，那裏指明出，工人階級政黨為能把工人階級引上正確的道路，在我國條件下應是怎樣的一個黨。

一九〇五年，他寫作了『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

一九〇七年，當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失敗——其原因之一是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聯系不夠——已

明顯地顯露出來時，列寧就寫作「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這部大著作，在這個著作中，他很據此次革命底經驗特別着重地指出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戰團聯合底必要。

往後凡與工人運動有關的每一基本問題，都是由列寧特別仔細地研究過，他都把它同馬克思底理論聯系起來。大家知道，列寧在世界大戰正酣時所寫的那本「論帝國主義」的著作，以及十月革命前夜所寫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列寧著作的特點是在於：他善於將理論與實際聯系起來，任何實際問題都不與理論脫離，善於把每個理論問題同目前所處的時機，同活生生的現實緊相聯系起來，使理論成爲讀者親切易懂的理論。列寧既善於在他的科學工作中又善於在他的口頭宣傳和書面宣傳上把理論與實際深刻地聯系起來。

這樣，他之善於把理論與活的實際聯系起來，善於使理論成爲易懂的，並闡明實際的生活，也是列寧之爲一個宣傳家的特點。

列寧之研究理論和實際環境不只是因爲這是很有興趣的。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底光芒來照耀實際現象時，總是力求從這裏做出那些足以作爲行動指南的結論。列寧底宣傳總是與在該時機中須得作什麼的問題緊密地聯系着的。依里奇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在瑞士做關於巴黎公社的報告時，他不僅敘述了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奪取政權的情形，不僅引證了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估計，而且他還做出關於俄國工人在奪取政權後應當作些什麼的結論。列寧常善於把理論變爲行動的指南。

這樣，善於把理論變爲行動的指南，是列寧之爲一個宣傳家的特點。

雖然列寧有淵博的學識，有宣傳家的豐富經驗，——他作過很多報告，寫過許多傳宣性質的文章

章，——但是他對於自己的每次發言，每個報告，每次講演都仔細地準備過。從保存下來的列寧許多發言和報告底綱要中，可以看到，列寧是如何細心地思索過他每次帶有宣傳性質的發言。根據這些綱要我們可以看到，列寧底發言有多麼豐富的內容，他是如何善於把最必要、最重要的東西揭示出來，並用鮮明的例子來解釋每種意思。

仔細地準備帶宣傳性質的發言，是宣傳家的列寧所具有的特點。

依里奇在其帶宣傳性質的發言中，毫不迴避困難問題，毫不模糊這些問題，恰巧相反，他却極嚴格和極具體地提出這些問題來。他不害怕鋒利的辭句，故意地把問題尖銳化，他並不以為宣傳家的演說是應當像溪澗平水那樣靜靜無聲；他的講話很嚴峻，常略帶些粗暴，但能鑽入腦際，使人興奮，使人嚮往。

列寧是一個嚴格地提出問題，並以其熱情去吸引聽衆的宣傳家。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常常仔細地研究羣衆，知道他們勞動和生活底條件，知道那些使他們焦急的具體問題。他在羣衆面前發言，常是針對着聽衆來作的。他在報告講演和談話過程中，估計到聽衆在這些時刻所特別焦急的是什麼，他們所不瞭解的是什麼，他們認為特別重要的又是什麼，依里奇常常善於按注意的程度，按問題，按插話，按發言，來明白聽衆的情緒，善於迎合聽衆的興趣，回答他們所不明瞭的問題，而掌握着聽衆。

列寧是一個善於掌握聽衆，與他們建立必須的相互瞭解關係的宣傳家。

末了，還須指出，他對羣衆的關係，會使列寧底宣傳發生怎樣的力量。他對工人，農民——貧

農、中農和紅軍的態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一種平等的同志關係來對待他們。在列寧看來，他們並不是「宣傳底對象」，而是許多歷盡艱辛，熟思苦慮，要求對其需求加以注意的活的人物。『他很鄭重地同我們談』……工人們在講到他時都這樣說，並特別珍重他那種簡樸的同志態度。聽眾看到，他所解釋的問題，正是他們親身感覺到的，使他們興奮的問題，這樣一來就使聽眾更加信服。

善於簡明地解釋自己的意思，用同志的態度來對待聽眾，這就是依里奇宣傳力量底所在，就使這種宣傳特別卓著成效。

在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間是沒有牆壁隔着的。善於以自己熱情之火感動聽眾的宣傳家，同時也就是鼓動家。善於將理論變為行動指南的宣傳家，無疑地就會使組織家庭工作容易起來。

在列寧底宣傳中鼓動的聲調和組織者成份都是很強烈的，但這並不減弱這種宣傳底力量和意義。

讓我們向宣傳家的依里奇學習吧。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列寧時常重覆他們的這句話。他的全部活動都是致力於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工人階級廣大羣眾的行動指南。

列寧於一八九三年到彼得堡後，就立即到工人小組中來向工人們解釋，馬克思如何估計現狀，他對社會發展方向的估計怎樣，他對工人階級及其與資本家階級的鬥爭賦予了何等意義，他為什麼認為工人階級底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力圖盡可能簡單地講，並從俄國工人生活中來舉例；他看見，工

人們聽得很有興趣，並很好地領會着馬克思學說底基礎，但同時他却感覺到，只說：「要廣泛地開展階級鬥爭」是不夠的，還須指明，如何開展這一階級鬥爭，應在什麼問題周圍去組織它。任務是在於把那些特別使工人羣衆憤激的事實拿來，加以闡明，並指出，爲要消滅這些事實或改變這些事實須得作些什麼。起初，在九十年代，最使工人憤激的是冗長的工作時間，罰款，尅扣工資，粗暴的待遇等問題，列寧領導的小組就照這樣的路徑來進行工作：到個別工廠中的工人們那裏去工作的同志就幫助他們向廠方提出某些要求，把這些要求加以解釋並印刷在專門的傳單上。這些傳單把工人們團結起來了，他們一致地贊助了傳單上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鼓動工作把工人羣衆捲入鬥爭了。

列寧於一八九七年在其所著「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小冊子中寫到：「與宣傳工作緊密聯繫而不可分離的，是在工人中間進行的鼓動工作，在俄國現時政治條件下，就工人羣衆發展水平來看，這個鼓動工作就自然成爲首要的工作了。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工作就在於：社會民主黨人去參加工人階級鬥爭底一切自發表現，去參加工人爲工作時間，工資，勞動條件等等要與資本家發生的一切衝突。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動與工人生活中的實際日常生活問題溶合起來，幫助工人來理解這些問題，使工人去注意到最重要的舞弊現象，幫助他們來更確切和更實際地規定自己對於僱主的要求，發展工人們對於自己利益一致的意識，對於全體俄國工人——即全世界無產階級軍隊組成部分之統一的工人階級底共同利益與共同事業的意識」（『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七九頁）。

列寧在一九〇六年，講到社會民主黨利選當選人和覆選當選人應如何在農民中進行鼓動工作時寫道：「爲證明無產階級在現代革命中先鋒隊的作用，只是重複『階級的』這一字眼是不够的。爲證明無產階級底先進作用，只來敘述我們的社會主義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底一般理論是不够的。爲要做到這點，還須在分析現代革命底迫切問題時，著於在實際上指明工黨黨員是最澈底、最正確、最堅決、最巧妙的來捍衛這個革命底利益，這個革命完全勝利的利益」（『列寧全集』俄文出版，第十卷，第一四三頁）。

照列寧學說講來，鼓動是把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這就是鼓動工作的力量。

鼓動在工人經濟鬭爭的事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教會他們利用罷工作爲與資本家鬭爭底方法，並在改善工人階級狀況專業上獲得了許多成功。

但經濟鬭爭的成功却在社會民主黨人中引起了「經濟主義」這一流派的產生，它的表現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估計不足，崇拜自發性，傾向於僅以改善自己經濟狀況的鬭爭來限制無產階級底任務，因而也就傾向於縮小工人羣衆中的政治鼓動工作。

列寧於一九〇二年在「做什麼？」一書中，反駁經濟主義者時寫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註）。當醉心於最狹隘形式的實際運動的情緒與機會主義的時髦宣傳打成一片時，是必須始終努力堅持這種思想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註）着重點是克魯普斯卡婭所加。——譯者註。

鼓動是使羣衆積極化底一種方法，運用這一方法的，不只是馬克思主義者，而資產階級在鼓動方面早就有了巨大的經驗。但有各種各樣的鼓動。列寧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說，只有「正確的理論上的判斷；才能保證鼓動工作中的堅固成效」（『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二六頁）。

對理論估計不足，對理論意義的輕視，——「不管這輕視者是否願意這樣，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實際上就等於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於工人的影響」（『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九〇頁）。因此，列寧認為有重要意義的，就是鼓動工作底內容。

他反對把鼓動內容只歸結爲一種號召，而要求把鼓動工作與解釋工作聯系起來。

列寧認爲鼓動工作的力量是在於有正確的解釋工作，明白的但形式簡單的解釋工作。一九〇六年列寧在「社會民主黨與選舉協定」一文中寫道：要「會說羣衆易懂的話，簡單明瞭的話，堅決拋棄那套笨重的貨色；深奧的術語，難解的外國字句，死記的，現成的，但羣衆還不瞭解，還不認識的口號，定義，結論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當然這並不是說，列寧否認口號底益處。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於一九一一年寫道：「把那些足以提出最近政治實踐中最根本問題的，使在各方面開展社會主義宣傳上有最方便、最親切理由和材料的簡短的總的口號，選舉口號提供出來作社會民主黨底選舉政綱的結尾常常是有益的，而有時還是必要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二四六頁）。列寧是不允許任何的蠱惑人心的宣傳，不允許有激發羣衆中的不良本能和利用其愚昧無知來玩弄把戲的。他曾說：「我始終都要重複說，蠱惑人心者是工人階級最壞的敵人」（『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五五頁）。蠱惑人心的宣傳，假的

諸言總是使列寧憤慨。例如社會革命黨就連什麼都允許了農民。

列寧從來不把自己未深刻相信的東西許給農民的。他不許爲要達到成功而對我們社會主義目的和嚴格階級立場有所緘默。而羣衆也就感覺到這點，並瞭解到列寧同他們談話是「很鄭重的」（一個工人回憶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作鼓動演說時的評語）。

列寧強烈地反對了那些企圖縮小鼓動內容的經濟主義者。他還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八九七年）一書中就寫道：「如果在經濟方面沒有一個工人生活問題不可利用來進行經濟鼓動，那末在政治方面也就沒有一個問題不可到用爲政治鼓動底對象。這兩種鼓動，在社會民主黨人底活動中是不可分離地聯系着，好似一個紀念章底兩面。無論經濟鼓動或政治鼓動都同樣是爲發展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所必需的，無論經濟鼓動或政治鼓動都同樣是爲領導俄國工人底階級鬭爭所必需的，因爲任何階級鬭爭都是政治鬭爭」（『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八一至一八二頁）。

「全國的政治鼓動正是在政治上訓練無產階級之迫切利益與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體人民，即其全體民主份子的迫切利益此彼吻合的一個焦點。我們是過問一切自由主義的問題，對它確是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設法使無產階級積極參加這一問題的解決，並使這個問題的解決適合於它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我們的直接義務」（『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五六頁）。

「我們能否只限於宣傳工人階級仇視專制政體的思想呢？當然是不能的。單是解釋工人所受的政治壓迫是不够的（正如單是向工人解釋他們的利益與其主人的利益相衝突，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利用這種壓迫每一具體表現，來從事鼓動（正如我們已利用過經濟壓迫具體表現的機會來從事鼓動

一樣。但是因爲這種壓迫是落在社會裏各種極不相同的階級身上，因爲這種壓迫是表現在各種不同的生活領域和活動上面——職業的、公民的、個人的、家庭的、宗教的、科學的及其他的。生活領域和活動上面，所以我們不來在政治上從各方面揭露專制政體，我們就沒有履行發展工人底政治意識的任務，這點難道還不明顯麼？爲要利用壓迫底具體表現來從事鼓動，應不應當把這些表現揭露出來（正如要從事經濟鼓動應當把工廠中的惡現象揭露出來一樣）呢？」（『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〇四至四〇五頁）。

當時在國外出版的秘密報紙——『火星報』把政治壓迫揭露出來的任務肩負起來了。據依里奇的意思，這一報紙的任務應成爲集體的宣傳者，集體的鼓動者和集體的組織者，幫助把工人羣衆的積極性注入於一定的軌道中去，並提出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問題，依里奇在一九〇二年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寫道：『……全部政治生活，是無窮的連環所組成的漫無終結的鏈條。政治家底全部藝術，就在於找出和緊緊地握住最容易從手中脫去的一個環節，握住那在現時說來是最重要的，最能保障握住此環節的人去握住整個鏈條的一個環節』（『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八七頁）。

『火星報』在列寧領導下善於選擇最重要問題，並在其周圍開展最廣泛的鼓動工作。

正確地建立起來並包括廣大工人羣衆的政治組織也就提高了鼓動者底作用。

依里奇曾教導我們說，一個鼓動家就是善於同羣衆講話，善於用自己的熱忱之火燃燒羣衆，善於抓住令人注意的，足以說明一切的事實的人民演說家。這種人民演說家底演說是會在羣衆中找到回聲，而爲革命階級底毅力所響應所贊助的。列寧自己就是這樣的鼓動家和這樣的人民演說家。

一九〇五年夏，列寧在「兩個策略」這一小冊子內指出說，「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全部工作，都完全確定於這樣一個穩固不變的定型中，這個定型絕對保證把工作重心集中於宣傳和鼓動，集中於飛行集會和羣衆大會，集中於散發傳單與小冊子，集中於協助經濟鬭爭並及時提出它所資求的「口號」」（『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九八頁）。

鼓動已變爲經常的工作方法了，已完全有了定型，但這並不是說，列寧允許在鼓動工作中有絲毫的死板化。

他要求要善於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各種不同階層的人民。依里奇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寫道：「每個社會民主黨人，不管在什麼地方發表政治演說，總要講到共和國的問題。但關於共和國問題須得善於講說：決不可在工廠大會上和在西薩克人的鄉村中，在學生會議上和農民的房屋中，在第三屆杜馬講壇上和在外國出版報紙的篇幅中，都一樣地來講。每個宣傳者和鼓動者底藝術就在於，用最好的方式去影響當時的聽衆，使某種真理對他們最帶說服性質，最容易領會，最明顯和最牢實地記在心上」（『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二八八頁）。當然，這並不是說，對這般人應該說一種道理，對那般人又該說另一種道理。問題只是提法不同罷了。

我記得，我們這幾年住在巴黎，並到處參加各種選舉會議，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對社會民主黨人在各種不同會議上發言的方法問題特別有興趣。我記得，有次我們聽見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工人大會上的演說，後來又聽見他在知識界主要是小學教師大會上的演說。報告人在第二個大會上的演說，與他在工人大會上的演說簡直大不相同。他是在選舉中得到更多的選票。我記得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對

這件事很憤慨地說：在工人面前算是激進派，在知識份子面前就是機會主義者了！

列寧認為善於根據當地材料解釋一般的口號，是最重要的。列寧於一九〇五年代表「無產者」編輯部寫信給「工人報」說：「在地方鼓動工作中要盡量利用中央機關報，不僅要轉載它，而且還要

在傳單上重述其思想和口號，並參照地方條件來發展或變更這些思想和口號及其他等等。這對我們彼此間在實際上的合作，對於交換意見，對於糾正我們的口號，使工人羣衆意識到我們有經常出版的黨中央機關報，是極其重要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六五頁）。

爲了要善於接近羣衆，就必須研究羣衆，——列寧會經常反覆說到這點。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着羣衆，善於傾聽羣衆的意見，善於瞭解羣衆所說的一切，並善於把握住工農羣衆所極想吐露出來的一切問題底實質。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論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基本任務提綱」中，講到無產階級專政，講到共產黨員應如何在各處準備實行這個專政時寫道：「無產階級專政是資本主義全黨歷史所準備就緒來起這種領導作用的唯一階級對全體受資本家階級壓迫，禁錮、抑壓、恐嚇、離散和欺騙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領導之最完全的實現。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底準備就應用以下的手段立即在各處開始起來。」列寧講到必須組織共產主義支部時，繼續說：「並且這些支部，其彼此間及其與黨中心間有着密切聯繫，它們相互交換經驗，實現鼓動、宣傳和組織底工作，堅決適應於社會生活底一切領域，堅決適應於勞動羣衆底一切階層，這樣的支部就應當有系統地以這樣多方面的工作來既教育自己，又教育黨，又教育階級，又教育羣衆。」其次：「要特別耐心地，小心地學習接近羣衆，要善於瞭解這羣

象中每一階層，每種職業底心理特點及其特徵」（『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一八頁）學習接近羣衆，——依里奇認爲這就是黨準備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自己一生都是用特別堅毅的精神學習了這點。

在選擇進行鼓勵工作的口號時，列寧也同樣是不允許任何死板化的。選擇口號的問題他賦予了特別的意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黨工作人員會議上報告小資產階級政黨問題時，曾指出說，「……每種口號都會得到超過需要程度的硬化能力」（『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三二九頁）。在每個階段上，在鼓勵工作方面善於從許多事實鏈條中去把爲了把擲全部鏈條，闡明全都現象總合而必須抓住的環節選擇出來，對這樣的敏捷能力依里奇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九十年代初我進到了學生小組，——常時我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組的同志們會把米爾托夫（拉福洛夫）（註）所著的「歷史信件」一書給我讀。這些「歷史信件」給了我一種很強烈的印象。幾年後，當我已放逐到壽沙村時，我會同依里奇談到這個問題。我對這「歷史信件」的批評是很「溫和」的，依里奇則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來批評了它。「當拉福洛夫說：「革命的旗幟有時可以成爲反動的旗幟」時，難道他這話不對嗎？」——這就是我的最後一個論據。這個思想依里奇同意了，但他補充說，這並不能使整部書都正確。

黨在其全部活動過程中，一方面忠實於自己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依據已變更的條件而經常改變其口號。工作底條件是經常改變的。

一九〇五年夏依里奇向俄國寫述關於使工人認識到，在國外某處存在有一個秘密出版兩千份，秘

密運入國境、並秘密推銷的黨中央機關報的重要。只是個別的份數才落到了工人手裏。但幾個月以後條件就根本變更了。列寧於一九〇五年十月末寫信給普列漢諾夫說：「現在我們影響無產階級之最廣泛的講壇就是彼得堡日報（我們有可能出版十萬份報紙並辦到一個哥比一份）」（『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三五〇頁）。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依里奇會寫道：「作為鼓動講壇的國家杜馬是有巨大意義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三〇五頁）。自由派和立憲民主黨人，也是瞭解這個意義的，他們還在第二屆國家杜馬時，就時常要求布爾塞維克放棄自己把杜馬當作鼓動講壇的觀點。

我再重複一遍，根據條件的變更，而口號也隨之變更了。

（註）彼·拉·拉福洛夫（米爾托夫）（一八二三至一九〇〇年），革命民粹派最著名的理論

家。他在國外出版過（起初是在蘇黎支，後來在倫敦）『前進報』（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六年），在報上發揮關於為了進行長期宣傳工作和以社會主義思想精神重新教育人民羣衆爲目的就必須『到民間去』的觀點，來與那些認爲俄國人民已準備好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到人民中去立即組織暴動爲目的的巴枯寧暴動派的觀點相對立。曾任『民意導報』編輯（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直至死時爲止（一九〇〇年），是民粹派觀點最有威信的解釋者。他所著『歷史信件』一書，對俄國革命知識份子是有巨大影響的。——克魯普斯卡婭

註。

列寧在一八九七年著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小冊子中寫道：「俄國社會民主派不應當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應當集中一切力量在城市無產階級中間進行工作。到鄉村去進行鼓動工作，在當時只不過是白費氣力罷了。但在一九〇七年依里奇却寫道：『要十倍地加強我們在農民中——在那些有的是在鄉村中挨餓，有的是去年秋季把自己經歷過革命的偉大一個年份的兒子派去當兵的人們中間，進行鼓動和組織底工作』」（『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三七一頁）。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布爾塞維克是主張召集立憲會議的，但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當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他們就解散了立憲會議，因為從前這個會是革命的口號，後來却成爲反動的口號了。

善於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估計時機，善於在一切聯繫和因果關係中去觀察事變，在事變的發展中來觀察事變，確定工人階級在當時爲取得勝利須得作些什麼，——總而言之，由於辯證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估計時機，這就以正確選擇口號和把握主要環節的本領把黨武裝起來。列寧對分析黨在每個階段上的任務問題有着特別的成就。正確選擇口號，這就使理論與實際聯繫起來，使鼓動工作特別有成效。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前所提出的和平底口號，關於土地的口號，是保證工人階級取得勝利的口號，是深刻激動全體農民羣衆和兵士羣衆的口號。列寧把那些看起來雖很鮮明，但不是以估計實際情況爲基礎的口號叫作革命的空談。

當一九一八年提出必須接受與德國媾和的苛刻條件問題，而許多同志出來反對締結和約並說必須進行革命戰爭時，列寧就在「論革命空談」一文中來反對他們。

列寧在這篇文章內寫道：「革命空談就是在事變底一定轉折關頭，一定現存情況下，不去估計客

觀情況而把革命口號加以重複而已。口號儘管是卓越的，迷人的，使人沈醉口號，——但是沒有根據，——這就是革命空談底實質」。往下列寧又繼續說：「：誰不願意以空洞詞句，誇大言辭，無謂的叫囂來自慰，誰就不能不看到，革命戰爭底『口號』在一九一八年二月是一點現實基礎和客觀基礎都沒有的空洞言詞。感情，希望，奮懣，難堪——這就是當時這一口號的唯一內容。祇有這樣內容的口號，就叫做革命的空談」（『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依里奇於一九〇八年在反動熾烈時期內寫道：

「政治鼓動工作是從來不會白作的（註）。它的成功不只是以我們是否能立即獲得大多數或取得政治上的協同動作爲標準。可能，我們不能一下子就做到這點；我們是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政黨，所以就不要灰心於暫時的失利，而應——那怕是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頑強地，不屈不撓地，堅定地來進行自己的工作」（『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三三九頁）。

實際生活指明了，依里奇是說得多麼正確。一九一二年革命高潮開始了，使一九〇五年底傳統又恢復起來了，使工人爲回營連拿事變而舉行了巨大的羣衆罷工。工人們立即提高了並活潑了這一傳統。

列寧把革命的羣衆罷工叫作無產階級的鼓動方法。

他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寫道：「俄國革命第一次大規模的發展了這個無產階級的鼓動方法，把羣衆振作起來，團結起來和吸引來參加鬭爭的方法。現在無產階級重新地並更堅決地來應用這個方法。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應用這個方法所實現的事業是世界上任何力量所不能實現的。一個巨大的國家，有

一萬萬五千多萬人口，他們散處在廣大的幅員上，被分散、被壓迫、被壓迫、身無權利，愚昧無知，並爲無量數的當權者、警察，密探所重重防範使其不受「惡劣有害的影響」，——而這個巨大國家整個的動蕩起來了。工人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都與罷工者發生直接的和間接的關係。幾十萬革命鼓動家立即出現舞台了；由於他們與下層人，與羣衆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不離他們的隊伍，爲每個工人家庭的最迫切需要而鬪爭，把政治抗議以及反專制制度的鬪爭同這個爲迫切經濟需要的直接鬪爭聯繫起來等，就使他們鼓動家的影響無限地加強起來。因爲反革命已使千百萬羣衆對專制制度懷着極端的憎惡，使他們開始瞭解專制制度底作用，而現在首先都進工人的口號——民主共和國萬歲！——就隨着每次罷工，經過成千溝渠而流入落後階層，流入偏僻省份，流入「民間」，流入「俄羅斯腹地」，（「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五三五至五六頁）。羣衆正在爲事實所說服，他們不是相信言詞，而是相信行事的。列寧在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發言說：「我們知道，現時在人民羣衆中已可聽到另一種意見了。他們自言自語說：現在不要害怕背槍的人了，因爲他們是保護勞動者並無情鎮壓剝削者底統治的。這就是人民所已經感覺到了的，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那些尋常的、沒有學問的人們說明赤衛隊員盡力反對剝削者而進行的鼓動就是不可戰勝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二二一頁）。

鼓動工作在內戰時期採取了非常廣大的範圍。當時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了許多宣傳列車

（註）着重點是克魯普斯卡婭所加。——譯者註。

和宣傳輪船。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很注意它們的工作，並給予了關於選擇人員，關於鼓動性質，關於統計所作工作的指示。

蘇維埃政權底各種法令，是有很大的宣傳和鼓動意義的。列寧寫道：「：如果我們拒絕在法令中指示道路的方法，那我們就會叛變社會主義。這些實際上不能立即完全實現的法令，對宣傳工作是起着巨大作用的。從前我們是拿一般的道理來進行宣傳，而現在我們就以工作來進行宣傳了。這也是一種宣傳，但這是以行動來進行宣傳——只不過不是我們在無政府主義者和舊社會主義盛行時代常譏笑過的那種風頭主義者的單個行動。我們的法令是一種號召，但不是從前的「工人們起來吧，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吧！」式的號召。不，這是號召羣衆，號召他們進行實際工作。法令，是號召去作廣泛實際工作的指令。這是很重要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六六頁）。

依里奇不僅把鼓動工作與宣傳工作緊密聯繫起來，同時也與組織工作緊密聯繫起來了。鼓動工作幫助羣衆組織起來，——列寧最初就這樣說，——團結他們，幫助他們協同動作。鼓動工作在革命時期有巨大的組織意義，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其組織意義也是巨大的。鼓動的形式雖然有變更，但鼓動工作却仍有其組織意義，就是說以事業，以工作，以活的榜樣來進行鼓動。

●列寧對以活的榜樣來進行鼓動工作的問題給予了特別的意義。依里奇在其於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間所寫的「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一文中，特別着重指出活的榜樣在蘇維埃政權下所具有的鼓動意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個別榜樣底意義，例如，某一個生產組合底意義，必然有其有限的；只有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才能夢想以慈善機關這種榜樣底影響去一矯正——資本主義。當政權已轉

入無產階級手裏，剝削者已被剝奪後，情形就根本變了。並且，——據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屢次的指示，——榜樣底力量破天荒第一次地能夠來表示其大量的影響。模範公社應成爲，而且必然成爲落後公社底訓練者，教師和推動者。刊物應成爲社會主義建設底武器，仔細述說模範公社底各種成績，研究其成功底原因，其經營經濟底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頑強地保持一資本主義傳統——即保持無政府狀態，懶惰，無秩序，投機等傳統底公社列名於「黑板」上」（『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四五六頁）。

列寧既然認爲以活的榜樣來進行鼓動工作有巨大意義，所以就對社會主義比賽給予了巨大的鼓動意義。依里奇要求在各部门，連國民教育也在內，來實行社會主義比賽。一九一九年二月他寫信給人民教育委員部校外工作科說：「圖書館的事業首先要要求在各省，各團體，各讀者間號召比賽」。其次他就詳細講到，應根據什麼問題來開展社會主義比賽。

當國內戰爭快告終結時，依里奇就着重提出必須把宣傳和鼓動工作轉到新的軌道上，即將其與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尤其是與經濟建設任務，和計劃經濟任務盡量緊密地聯系起來。

列寧說：「舊式的宣傳，是來講說，並舉例說明什麼是共產主義。這種舊式的宣傳是完全不中用了，因爲現在是要在實際上指明，應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全部宣傳工作應當建築在經濟建設底政治經驗上面；現時我們的主要政策應是國家底經濟建設；全部鼓動和宣傳工作應完全在這一基礎上建築起來。

：每個鼓動員都應成爲國家的領導者，經濟建設事業中全體工農的領導者」（『列寧全集』俄文

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五四至四五五頁）。

• 列寧要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屬下的宣傳列車和宣傳輪船用吸收農業技師、技師到他們政治處，挑選好的技術書籍，選擇具有適當內容影片的辦法來加強自己的經濟工作和實際工作部份，要求攝製關於農業和工業問題的影片，到國外定購相當的影片。

他要求政治教育局進行廣泛的生產宣傳，擬定這一問題的提綱，要求研究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生產宣傳和生產鼓動底形式，研究我們應用這些方法底經驗。他作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計劃報告時，要求吸引廣大工人羣衆參加電氣化的工作，要求對爲電氣化統一計劃而鬭爭的全部鼓動工作賦予政治的內容，要求擴大工人的工藝知識，因爲沒有工藝知識是不能瞭解計劃經濟底實質的。

列寧極想把蘇維埃國家變爲以活的榜樣和例證來影響人們的一種宣傳所，——變爲給世界無產階級指示道路的火炬。

• 斯大林同志發揮列寧的這個思想說，蘇聯應成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突擊隊」。
我國千百萬自覺的男女工人和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在黨和蘇維埃政權領導下正在進行這一工作。

列寧是黨刊物底編輯者和組織者

(一) 公開刊物和秘密刊物

當我們講到擔任編輯工作的列寧時，我們所注意的，當然不是把列寧當作一般的編輯者看待，而是把他當作力圖在每篇文章上、每句話裏、每個字中來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把報紙和雜誌作為共產主義鬭爭武器之黨員編輯者和共產主義者編輯者看待的。

當沙俄新聞檢查條例還極端猖獗，那時候經過刊物來發表共產主義觀點，進行宣傳鼓動，幫助去組織黨和組織工人，只有在秘密的刊物上才有可能，新聞記者的列寧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自己的工作。

以下就是列寧估計當時報紙情形的一段話：

「當秘密刊物與公開刊物間還存在有區別時，關於黨刊物和非黨刊物問題的解決是極簡單，同時也極虛偽和畸形的。一切秘密刊物都是黨性的，出版這些刊物的組織和主持這些刊物的團體都是與黨的實際工作人員集團有某種聯繫的。一切公開刊物是非黨性的，——因為黨性的遭受禁止了，——但却一傾向於某一政黨。各種畸形的聯合，不正常的「同居」，虛偽的掩蓋是不可避免的；於是不認

職黨的觀點和實際上不够黨員資格人們之思想糊塗或思想怯懦的情形，就與那般希望表示黨的觀點的人們之迫不得已的含蓄隱諱混淆起來」（『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三八六頁）。

九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已在我國開始散佈時，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曾力圖打進合法刊物中去，以便經過這種刊物來擴大自己的影響。然而在經過沙俄檢查的刊物上，那些年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在掩蓋和偽裝的形式下，才能把自己的思想偷運過去。於是就只得用暗語，暗示來從事寫作。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論文當時很難讀到。但這樣的論文却是必要的。依里奇常把契內舍夫斯基拿來作例，指出他在當時最困難的檢查條件下善於說出極多的東西。同時依里奇也很器重他，因契內舍夫斯基如果沒有可能說出自己的意見時，那他就善於緘默，而不說違反他信念的話。

在當時沙俄公開的和經過檢查的雜誌上，是完全不能涉及最重要問題的，它之所以不能涉及，是因為在某些問題上與其說半句話或只說四分之一，倒不如不說的好。偷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又只在類似關於統計，關於市場等帶理論性質的文章中才可能，而且就在那裏，沙俄的檢查員也很快就已學會把它揭露出來，學會解釋暗語，把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任何萌芽都勾掉。

列寧曾為當時公開出版的『開始』雜誌和『新言論』雜誌寫文章，但自己却沒編輯任何公開的雜誌，沒有參加任何編輯部的工作。

秘密的社會民主黨刊物是從傳單開始。然而當時必須創辦一個共同的黨報。

一九〇〇年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火星報』和『曙光』雜誌編輯部聲明書草案中寫道：

『第一，必須擬定一個共同的黨的刊物，所謂共同的，這就不僅在它應對全俄運動服務，而不是

對個別區域服務，它應討論全部運動的問題，幫助自覺無產者底鬪爭，而不以地方問題爲限的意義上說來，是共同的，而且就在它應聯合一切現存刊物力量，應表現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那些已不復是彼此隔絕的工作人員，而是有共同綱領和同一組織隊伍中的共同鬪爭聯繫着的同志們的各種意見和觀點說來，也是共同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七頁）。

列寧對組織黨刊物這件事認爲是很重要的。在俄國出版秘密報紙是不可能的，因爲它屢次都遭受了破壞。列寧打算在彼得堡出版小型秘密刊物『工人事業』雜誌的企圖，也遭受了失敗。

列寧爲要在國外創辦全俄雜誌和報紙，就到國外去了。

列寧怎樣來劃分報紙和雜誌的區別呢？請看他關於這個問題所寫的這段話吧：

『至於說在雜誌和報紙間來分配我們所擬定的主題和問題，那末那一部分就完全是以出版物之篇幅上和其性質上的差別爲轉移的；雜誌應主要地用來進行宣傳，報紙應主要地用來進行鼓動。但無論在雜誌上或報紙上都必須反映運動的各方面，並且我們特別想着重指出我們絕對反對使工人報紙在自己篇幅上只登載直接涉及自發工人運動的材料，凡關係於社會主義理論，凡關係於科學、政策、黨組織問題等等方面的材料一概推到供知識份子閱讀的機關刊物上去。反之，正是必須把工人運動底一切具體事實和表現都與上述各種問題聯繫起來，必須以理論來闡明每一個別事實，必須在最廣泛的工人階級羣衆中來宣傳政策和黨組織底問題，必須把這些問題列入鼓動工作內。直到現在我們那種幾乎獨佔統治地位的鼓動形式——以散發帶地方性質的傳單來進行鼓動的形式——已經不夠了；這種形式是狹隘的，因爲它只觸及地方問題，而且主要是經濟上的問題。要企圖造成更高級的鼓動形式——

用報紙來定期地記載工人的怨言，工人的罷工，無產階級鬥爭底別些形式，以及全俄政治壓迫的一切表現，並從每一個這樣的事實中做出適應於社會主義最終目的和俄國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確定結論」（『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九至第十頁）。

至關於全俄黨報的問題，依里奇認為它有極大的意義，他對這新機關報任務底瞭解是極爲廣泛的。他認為，報紙應成爲集體的宣傳者，集體的鼓動者和集體的組織者。報紙應與黨組織和工人羣衆日益密切的聯繫起來，從他們那裏去取得消息。洞悉他們的情緒，回答黨組織和羣衆所焦急的問題；它應把黨組織和工人羣衆團結於黨的一定口號周圍，它應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底光芒去照耀一切時事問題。

列寧在一九〇一年五月第四期『火星報』上『從何着手？』一文內，關於報紙的作用問題是說得極好的。

列寧參加『火星報』編輯部工作至第五十二期爲止，他之所以退出了『火星報』編輯部，是因爲孟塞維克已在那裏取得了領導地位。

後來，在一九〇五年就開始出版了布爾塞維克的『前進報』：它一共出版了十八期（新曆一月四日至五月十八日）。

列寧擔任了『前進報』編輯部的委員。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出版『無產者』報來代替『前進報』，並選列寧爲唯一的責任編輯。

國外出版物的份數是極少的，在運輸和推銷方面都極感困難。

因此依里奇對一九〇五年革命打破了檢查枷鎖使能出版公開的日報表示莫大的欣慰，這是很顯然的。

依里奇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動身回國前寫信給普列漢諾夫說：「新的公開報紙會有幾萬或幾十萬工人讀者，尤其是今後俄國全部工作都使俄國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的淵博學識和巨大的政治經驗，在這樣的時候，所有這些是會造成一種新的基地，而在這一基地上是最容易忘掉舊的，並在活的事業中和諧起來」（『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三四九頁）。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舊曆十三日）第十二期『新生活』報（第一個公開的布爾塞維克報紙，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九日（舊曆十二月十七日）開始出版，並繼續刊行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舊曆十二月三日爲止）上登載了列寧那篇標題爲『黨的組織與黨的刊物』的文章。依里奇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現在的刊物，甚至一公開出版的，十分之九可能成爲黨性的刊物。刊物應成爲黨的刊物。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提出黨刊物的原則，來與資產階級的習俗對立，來與資產階級企業主、商人的報紙對立，來與資產階級刊物的自私自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追逐利潤的情事對立，發揮這個原則，並盡可能廣泛地實行它」：「刊物事業應成爲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工作底組成部分」（『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三八七頁）。

「毫無爭論的，在這件事業中無條件地必須使個人的首創性，個人的志趣有極廣泛的活動園地，使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有極廣泛的活動園地。所有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但這只是證明，無產階

級黨務中刊物部分是不能死板地來與無產階級黨務底其他部分等量齊觀的。這決不能推翻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看來是很特殊的原則，即刊物事業是一定要而且必須要成爲與社會民主黨工作其他部分聯繫而不可分離的部分。報紙應成爲黨的各組織的機關報。編輯人員一定要進入黨組織中。出版部和儲藏室，書店和閱讀室，圖書館和各種書業的買賣——所有這些都應成爲黨的和受黨節制的組織。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注視所有這些工作，監督這全部工作，把活生生無產階級事業底生命汁注入到這全部工作中，一無例外，這樣來根本推翻那個在俄國流行的、老朽不堪的、半奧布洛莫夫式的、半商人式的原則：作家隨便作，讀者隨便讀——「我們想建立自由的刊物，而且我們定會建立自由的刊物，這不僅在對警察的意義上是自由的，而且在擺脫資本束縛，擺脫營私舞弊的意義上也是自由的；甚至在擺脫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個人主義的意義上也是自由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告訴你們，你們關於絕對自由的言詞只不過是一種虛偽而已。在金錢萬能的社會中，在勞動羣衆窮窮破產，而少數富豪寄生享樂的社會中，是不能有實際的和真正的一自由的。作家先生們，你們是否能擺脫你們資產階級出版人而自由呢？你們是否能擺脫那些要求你們把淫穢作品放在框子上和畫片上，並對「神聖的」舞台藝術加上賣淫生涯來作「補充」的資產階級讀者而自由呢？須知這種絕對自由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或無政府主義的一種辭藻空談而已（因爲無政府主義之爲宇宙觀，乃是變相的資產階級思想）。生活在這社會中而不受這社會的束縛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 and 演員底自由是掩蓋着（或虛偽地掩蓋着）的一種對錢袋、對賄賂、對養養的依賴罷了。

而我們社會主義者之來揭破這種虛偽，撕毀這些假招牌，並不是爲的要取得非階級的文學和

藝術（這只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中才是可能的），而是爲的把真正自由的、公開地與無產階級相聯繫的文學去與假自由的、實際上是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的文學對立起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募集新的力量到它的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觀念和升官發財的思想，而是社會主義底思想和對勞動者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爲它不是服務於那般不愁吃穿養尊處優的一幾萬上等一人物，而是服務於構成國家精華、國家元氣、國家將來的千百萬勞動者。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它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經驗和活的工作來培養人類最先進的革命思想成果，並使過去經驗（科學社會主義，它完成了社會主義從其原始的、空想的形式開始的發展）和現時經驗（工人同志們現時的鬭爭）彼此發生經常的相互作用」（『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三八七至三九〇頁）。

『新生活』報在十二月裏遭封閉了。從一九〇六年五月九日（舊曆四月二十六日）起又來發行布爾塞維克的『浪潮日報』；共出版了二十五期，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任該報編輯，很多期被沒收了，報紙因登載許多犯禁的文章遭到法庭處分，結果又封閉了。接着出版了『前進報』來代替它，十七期後，該報也被迫停刊了。又開始出版了『回聲報』，共出了十四期，所有各期全被沒收了去，而報紙也被封閉了。

列寧從革命高潮最初開始時起就預見到革命可能會被鎮壓下去，並堅持必須保存秘密的機關報——『無產者』。革命高漲時該報很少出版，而且是在芬蘭出版的。這有巨大的意義，因爲這使黨的組織，甚至在公開報紙停刊時，都有可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無產者』報從一九〇八年起遷到日內瓦，而後又遷往巴黎。一九一〇年中央全會決議各派別的

秘密報紙停刊，「無產者」報也在內，把「社會民主黨人」報變為全黨的機關報。列寧起先主編「無產者」報。後來又加入到「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工作。

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內列寧起初只得同孟塞維克一塊工作。這「只有痛苦」，——他說，但爲了工作起見當時也就同意了。在一九一二年的普拉加代表會議後，「社會民主黨人」報就完全成了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並繼續刊行到一九一七年爲止。

在反動年代是想不到自己的合法報紙的。但到一九一〇年末已開始顯出某些高漲徵候，於是十二月末就在彼得堡開始出版公開的「明星」日報了。在莫斯科則出版了布爾塞維克的「思想」雜誌。「你覺得「明星」和「思想」雜誌怎樣？」——依里奇在給高爾基的信中問道。——「前者，我覺得有些曖昧不明。而後者——完全是我們的並使我快樂無比。只怕它很快就會遭受破獲」（「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五九頁）。

結果正是如此。

一九一一年會是高漲底年份，這是從各方面都已感覺得到的。在巴黎城郊龍壽姆地方，布爾塞維克組織了工人黨校，鞏固了與俄國的聯系。一九一一年末把在彼得堡出版布爾塞維克的「教育」雜誌問題辦理就緒。一九一二年一月，召集了普拉加黨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是由布爾塞維克組織起來的，並在組織黨今後的全部工作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發生了連拿慘案，工人羣衆舉行了許多政治罷工來回答這一慘殺事件。「真理報」就在這一罷工浪潮的熾烈時期中誕生出來了。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舊曆四月二十二日）出版了第一期。

依里奇在寫給高爾基的信中說：「在俄國有革命高潮，不是什麼別的，正是革命的高潮。而我們終於出版了『真理』日報而且這正是傻瓜們所狂吠大罵的那個（一月的）代表會議的結果」（『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二三頁）。

今年我們將慶祝『真理報』二十週年紀念（註）。『真理報』公開的日報，——站在黨的崗位上已二十年了。它經歷了很多的艱苦。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論那服務於千百萬勞動者的黨報意義時所說的話，對它是完全適用的。『真理報』的工作就是在聯共（布）中央直接領導下，把黨的指令，把列寧的原則傳達到羣衆中去。

（二）只有原則上和諧一致與切實工作的編輯部
才能把報紙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

列寧認爲編輯部在原則上和諧一致與團結是有極大意義的。只有這種思想上的團結才能保證雜誌或報紙方針上的黨性。編輯部是不能按克里洛夫寓言中所說的由天鵝、黑魚、龍蝦三者打夥拉車的故事那樣組成的。第二次僑外期間國外出版了布爾塞維克黨機關報『無產者』（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起初列寧、波格丹諾夫和英諾肯梯（杜柏洛文斯基）都參加了編輯部。後來一方面列寧和英諾肯

（註）此文作於一九三三年。——譯者註。

梯，另一方面是波格丹諾夫彼此間發生了哲學上的爭論。依里奇還在一九〇八年夏季寫給沃洛夫斯基的信中就已涉及關於與波格丹諾夫日益逼近的分裂問題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報告會議上（決不是在編輯部裏）厲害的批評了他的哲學觀點，而認為這是侮辱』（『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五四六頁）。從這個放在括弧內的語句中可以看到，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編輯部內是不願意把問題尖銳化的，但沒有辦到。一年後，波格丹諾夫在『無產者』報編輯部擴大會議上，宣佈了退出布爾塞維克政派組織。他住在卡普利島上高爾基家裏時，向『無產者』報大肆批評。請看一九〇年弗拉基米爾·依里奇關於這個問題寫給高爾基的一段話吧：

「你和馬克西莫夫（註）以為『無產者』包含有不誠懇和毫無意思的成分等等意見，這完全是由於你們對整個現代情況（當然也對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不同。我們停在一一個地方來咀嚼那些早已爲實際生活所解決，但馬克西莫夫終究還以為是一爭論的」問題幾乎已兩年了。如果我們還繼續「爭論」下去，那我們現在又會白費時間的。各自分開吧，我們就來直接、明白而確定地向工人指出兩條出路。社會民主主義工人是會易而且快地來加以選擇的，因爲用保存（在罐頭裏保存）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革命辭句來代替把把革命方法應用於新的另一種情況下，應用於那要求別種方法和別種組織形式的已變時代中去的策略，這是死的策略。無產階級正走向革命並一定會走到革命，但不是循着一九〇五年前的道路：誰「相信」無產階級正走向並一定會走到，但却不瞭解這個「不是」，——誰就以爲我們的立場當然是不誠懇的，毫無意義的，枯燥的，是基於不相信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等等，等等。從此發生的意見分歧，無疑地是很深刻的，使分裂——至少是國外的分裂——成爲不可避免的

了。但如果按社會民主黨，馬克思主義者分裂的深度說來，那這一分裂就遠不像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間的分裂那樣深」（『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一九〇至一九一頁）。

按列寧的意見，只有原則上的和諧一致才能保證雜誌和報紙對羣衆的影響，才能保證黨報的徹底性。在有列寧參加的一切編輯部內，他都起了巨大的領導作用。實際上是他在領導報紙和雜誌。這常常是依靠著集體組織的。『火星報』編輯部底歷史最好不過地說明了列寧對編輯部成份的觀點。他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一個認真作事的三人團。其中參加人有：普列漢諾夫，列寧和馬爾托夫。列寧非常重視普列漢諾夫，認為他是與民粹主義者、伯恩斯坦派和經濟主義者進行過絕妙鬭爭的理論家。但他也知道普列漢諾夫的弱點。多年的僑外生活，——這些年代，黨還沒有建立，工人運動還剛才開始，所有這些都對普列漢諾夫留下了深刻的痕跡。普列漢諾夫是與當時正在開展着的工人運動隔絕了的。這點還在當時就已從他極下注意工人的通信，不善於傾聽從各地方來的工作人員的意見，少向他們提出實際問題等事實中看出來了。此外，他很驕傲自大，任何的批評都是忍受不住的，他簡直用恐怖來威脅自己『勞動解放』社的同事——查蘇利奇和阿克雪里羅得。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具有淵博的學識，並藉此淵博學識而把實際工作提到了更高的階段上。理論教導他去仔細地觀察實際生活，把握實際生活中最必需和最主要的東西，另一方面——革命的實踐又推動他的思想前進，教訓他更深刻地提出問題。依里奇比起普列漢諾夫來却完全是另一型式的理論家。但如果說，——某些人曾企圖這樣作，——

（註）即波格丹諾夫。——譯者註。

普列漢諾夫是理論家，而列寧則是實行家。那是極端錯誤的。並非如此。列寧也是個理論家，但却完全是另一型式、另一時代、而與建立黨的事業，與黨的全部工作活活聯系着的理論家。這就是他有利的地方。依里奇沒有那般博學理論家的傲慢色彩，他對一切問題都是從黨的利益和工人階級利益的觀點出發。他也就從這一觀點上來觀察自己，他瞭解，他是有力量的。據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意見，馬爾托夫乃是一個標本式的新聞記者。他是個善感的人。因而他就善於來瞭解在羣衆中和在各地地方所發生的一切，善於解答目前所發生的一切事變，這是他寢食不忘的事情。列寧很器重馬爾托夫的這一特點。但正因為馬爾托夫善感，所以他很容易接受各種影響。由普列漢諾夫，列寧，馬爾托夫所組成的三人團，是個最能踏實作事的三人團。至於頗特列索夫，查蘇利奇和阿克雪里羅得三人，——他們是和普列漢諾夫，列寧，馬爾托夫等人一同參加了代表大會前「火星報」編輯部工作的，——列寧却認為，他們是妨害編輯部底切實工作及其和諧性的。頗特列索夫根本就很少參加「火星報」編輯工作。「他是個少爺，——一個很知道他的亞·卡爾梅科娃在談到他時說，——除非有南海波濤般的妙景和躺在棕樹影下的味道，他是不寫作的」。至於說到查蘇利奇和阿克雪里羅得，那他們是從來不敢反駁普列漢諾夫，即多同他爭論一下，而在表決時總是贊助了他的在觀點。普列漢諾夫因在實際上有三票所以他就目中無人，大耍脾氣了。把極多的時間在毫無結果的爭論上和自使人生氣罷了。

這些事情如果用現代的話來表示，那就要說，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對一長制的見解，是各不相同的。

普列漢諾夫是這樣來瞭解一長制的，他就是編輯部，編輯部就是他。他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

列寧則是十足的集體主義者。他對編輯工作責任心的感覺並不下於普列漢諾夫，但他却力圖盡量運用每個編輯人員的力量，取得他們每個所能給予的一切，善於配合力量。編輯工作對他的幫助也是很大的。他深入於一切細節，因而也就大大地影響了其餘的編輯人，並善於按他所認為必需的那樣來領導報紙的工作。依里奇是個真正的編輯者。

(三) 編輯者列寧底工作

究竟列寧注意編輯者工作的哪些方面，這可從他於一九一三年致卡斯帕洛夫同志的信中看得出來。卡斯帕洛夫給「教育」雜誌寫了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

依里奇寫信給他說：「親愛的同志！你的文章我已收到並閱讀過了。據我的意見，主題選擇得很好，發揮亦頗正確，但文藝上的修飾還欠工夫。有過多的——不知是否可以這樣說？——不適用於討論理論問題文章的「鼓動」閑話。據我的意見，或者請你自己再改作一遍，或者由我們來試試」(「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九三頁)。

這樣，選擇主題，發揮主題，文藝上的修飾，這就是依里奇極為注意的三大要素。

主題底選擇具有重大的意義。要選擇政治上重要的、有切實意義的、涉及最迫切問題的主題。

我觀察過「火星報」編輯部的工作。我記得，每個主題都周詳地討論過。我記得列寧與普列漢諾夫關於選擇什麼主題的問題作過長時間的談話，交換過意見。連主題的配置——什麼問題應放在前面，什麼問題應放在後面，也都熱烈地討論。「火星報」編輯部大家聚在一塊時(或按通信的辦法)，

就詳細地來討論每一主題——它的共產主義比重。所以當見到編輯工作時，我就無意中了解到，選擇主題該有多麼巨大的意義。

當然，這對「火星報」是有特別意義的。當時還沒有中央委員會。「火星報」是唯一的黨的和真正的領導機關。這時是還得來規定最基本的理論原則和策略原則的時期。現在是另一種情況了，主題底規定較之從前容易得多，但人們總常常忘記，主題底規定該有何等決定的意義。在我們許多雜誌和報章上，主題底選擇常是聽其自流。這裏我們應向列寧學習。

主題問題與計劃性問題是密切聯系着的。選擇主題，配置主題——這就是計劃。計劃底一般性質是黨在某時期，某階級上的一般任務所決定。在依里奇起草的「火星報」和「曙光」雜誌編輯部聲明書草案中精確地說到了這點（「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一頁）。但是如果以為這對於雜誌，尤其是對於報紙已經够了，那是不正確的。每月底計劃都要針對着當前迫切的問題。它應把一般的原則具體化，而使每期能與「奔流的實際生活」更加密切聯系起來。不然，那計劃就會是死的計劃。

當然，出版秘密刊物，又是在國外來出版秘密刊物，這種條件會使報紙運到目的地時，而某些問題已呈現另一局面了。然而，依里奇總是特別注意到主題底迫切性，注意到計劃與實際生活的深刻聯系。

主題底論述法對雜誌和報紙說來，其意義是不下於主題的選擇的。主題底論述法是決定作品的立場。主題也許選擇得很好，但主題底論述法却決定問題是否闡明得正確。同一主題既可以走革命馬

克思主義底觀點上發揮它，又可以從民粹派底觀點上來發揮它，也可以從自由派底觀點上來發揮它。問題底關鍵就在於論述的方法。並且，即或主題是同一政派的人所寫出來的，而他們中間的色彩亦非常重要，把什麼問題提到首位，特別注意那些地方，在何種聯系中和因果關係中來把握問題，這也是重要的。

對青年記者說來，特別重要的是按列寧的文章來研究他論述主題的方法。依里奇寫文章的方法，使這一工作容易做了。他在寫文章前，通常是先寫好文章的概要。根據這種概要就可以探討依里奇的全部思維過程。有許多文章，其概要竟由依里奇修改過兩次，或三次；最有趣的，是把這些概要拿來比較一下，並確定，爲什麼依里奇改變了文章的計劃，修改後的計劃比起原先的計劃好在什麼地方，他在那個方向上改變了論述主題的方法。

也可以按依里奇的文章來探討問題底另一方面。他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他在工人運動發展的各個不同時期各個不同階級上來論述同一個主題。基本的意思仍舊不變，但這個意思却是從另一方面來闡明的；在較早的時期是多帶理論性，在較晚的時期是多帶鼓動性。例如，還在九十年代依里奇就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著作中寫到宗教觀念與落後經營形式的聯系，揭發了「各人只管自己，讓上帝去管大家吧！」這一謬論底根源。在一九二〇年，當關於過渡到新的經營形式問題成爲目前迫切問題時，依里奇在工人和紅軍兵士的非黨大會上也涉及了這個問題。或者如關於馬爾薩斯主義問題，他於九十年代在其所著「論對經濟浪漫主義的批評」（註一）一文中就已分析過，證明馬爾薩斯主義底小資產階級性，而後來，在一九一三年，當這個問題在醫生代表大會上發生時，他在「工人階級與新馬

爾薩斯學說」(註二)一文中又說到這一問題。把在這兩種場合下論述主題的方法拿來比較一下，那是很有趣的。我只限於來列舉一兩個例子。而在列寧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可以再好不過地看到，列寧怎樣把先前從科學觀點上加以研究過的某些問題去與各個不同時期底迫切問題聯系起來，他怎樣在新的聯系中，從新的方面和在新的情況下來觀察問題。在一九二二年有次我同依里奇談過這個問題，他認為，重要的是有誰闡明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與用辯證態度對待主題的問題有關的。這問題要求巨大的研究工作。它能給予極多的東西。在「火星報」編輯部內關於主題論述法進行過極熱烈的辯論。我因為是「火星報」編輯部的書記，所以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得以列席參加。主題論述法底討論就特別加深了問題底全部提法。

末了是文藝上的寫作法問題。文體應與內容相呼應。文章底語言和腔調應適合文章底論旨。理論問題的文章是不能用鼓動的腔調來寫，鼓動性的文章是不能用學院式的語言來寫的。寫作，這是一種藝術。腔調，體裁，善於生動地敘述，進行必需的比較，這是很重要的。依里奇對寫作法問題賦予了極大的意義，他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體裁上用了極大的功夫。大家關於依里奇底語言和體裁問題是寫得不少的。依里奇逝世不久後，在「左翼文藝」雜誌上登載出來的那篇文章，是我特別喜歡的。是這篇文章中闡明了，依里奇講話底結構如何使他的講話富有熱情，如何能於去強調其基本的思想，基

(註一)「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五至一一五頁。——譯者註。

(註二)「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等四九七至四九九頁。——譯者註。

本的色彩。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曾畢業於古典中學，枉費過極多的時間去研究拉丁文和希臘文。但這却喚起了他學習語言學的興趣。他能一連坐幾個鐘頭去翻閱各種各樣的字典，連達爾底字典也在內，最後一個時期他特別關心於這一字彙的再版問題。依里奇底文字是很豐富的，他使用了許多民間的成語和字句。時常被對員因沒覺察到這是從列寧著作中引證的話，而在書的空白地方，靠近某些成語或字句近旁，標出一些問號或驚歎號，有時則還直接自己的意見修改起來了。但列寧的許多著作底言詞，特別是帶鼓動性著作底言詞，對羣衆特別親切，特別易於理解。

列寧在自己的語言上用了很多的工夫。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從流放處致阿克雪里羅得的信中說，——我最願意的，是要學會寫工人讀物（註）。在我從流放處寫給列寧母親的一封信裏曾描寫依里奇如何在這個工作上來利用我的幫助；有時我應把自己裝成像一個既不懂外國術語和科學術語，也不懂某些人所共知事物的「無識」讀者。

善於寫作，這是一種藝術。而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特別器重編輯員與同事中那些具有寫作才幹的人。這不僅是體裁和語言的問題，而是發揮問題和闡明主題底全部姿態問題。在這方面列寧特別器重盧那察爾斯基，並曾屢次提到這點。有時，什麼一個人說出某種正確有趣的思想時，盧那察爾斯基就立即把握住這種思想，並如此美麗和如此有天才地把它表述出來，給它穿上這樣燦爛的裝束，竟使這

（註）「我最願意，最希望的，就是寫工人讀物的機會」（列寧全集，俄文版，等二十八卷

一思想底作者也爲之驚奇，懷疑這是他自己的思想，懷疑這樣簡單的思想而且常是笨頭笨腦的思想，居然弄成這樣意外雅緻和令人迷戀的形式。我幾次參加了列寧與盧那察爾斯基的談話，並看到他們彼此間互爲『琢磨』的情形。

現在我要指出，依里奇如何幫助編輯同人和親近的撰稿人工作。例如，要闡明某個新的主題。開始誰也沒表示願意寫作。於是依里奇就找起他認爲是最適於寫作這一問題文章的人談話，開始宣傳他。並不立刻提出要寫這個問題的文章，而首先來同他談到這主題中所涉及的問題，引起對於這些問題的興趣，然後又把他引到一定的方向上去，看對方說什麼。有時事成僵局再也不能進展時，那依里奇就另找旁人，又開始同他談話，當看到對方『上鉤』時，他就更詳細地來討論問題，他按回答和對話就可看出，對方將怎樣論述問題，那時他就詳細地敘述自己的意見，更詳細地發揮自己的觀點。然後他就提議——『你來寫寫這個問題吧，你是會寫得好的』。於是這位被依里奇的謙誠態度所誘導的人就答應了，而且敘述出來簡直常常是列寧的意見。在『前進報』和『無產者』報上有很多沒署名的文章。於是就有人爭論起來了：是誰寫的這篇文章呢——是依里奇還是旁人呢。有些人說：『當然，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這是他的言詞呀！』另些人就說：『不，這顯然是某某人寫的！』於是他們就爭論起來。當然，現在要來回憶起，某篇文章究竟是某人寫的，這是很困難的：這不僅先前的編輯們忘記了，而且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忘記了！——到底這篇文章是不是他們的。但這裏最明顯地表現出，不管這些文章是誰寫的，都可看到，這些文章如果不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親自寫的，那他至少也是參加其中主題底選擇和論述的。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不僅在編輯部內面和編輯部外面影響了作

者，而且他的全部革命活動，他在各種會議上的發言，他的文章等等也都影響了作者。

列寧對作者們的態度是很特質的。如果問題是涉及政治上已具有定型的，對政策頗有經驗的人物時，那就向他們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對前進派之決意與「真理報」合作的聲明書問題而寫給高爾基的信是很特質的。

「如果：如果你的假定正確，真如你所寫的那樣，「馬赫主義，造神派，以及所有這些玩意兒永遠沈沒」，那我是完全同意你對前進派之歸來所表現的那種喜悅態度的。如果是這樣，如果前進派份子已瞭解這點或現在就會瞭解這點，那我是熱烈贊助你對他們之歸來所表現的那種喜悅態度的。我之所以強調「如果」二字，因為這在目前還是希望多於事實」……

其次又說：

「如果他們已經瞭解，——那我就向他們道一千個好，而一切私人意氣（這是尖銳的鬭爭中必不可免的）就會立即消失。但是，如果他們還沒有瞭解，還沒有學會，那你就不要嘔氣吧：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一切誹謗馬克思主義或混亂工黨政策的企圖，我們是要同它拚死命鬭爭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二一頁）。

對有經驗的政治活動家提出一定的哀的美教書——要求原則上的堅定性。而對年青的，剛開始寫作的作家却是另一種關係——一種注意的，關懷的關係，給予許多如何改正錯誤的指示。如果列寧看到，年青的，剛開始寫作的作家由於缺乏經驗，或因沈醉於什麼而甚至犯了原則的錯誤，但能於學習，那末列寧就不惜任何時間來幫助他。當這位作者的文章沒有改善到應有程度時，他就立意不只一

次地，甚至兩次三次地來修改它。列寧在修改旁人文章時，總是力圖保存作者底個性。還常有這樣的事情，就是列寧當極小心地以暗示方法來給作者解釋，指出在文章裏需要作些什麼修改。

在這方面列寧致波里斯·克尼玻維奇的信是很有趣的。波·克尼玻維奇還完全是個年輕人，但同時他讀過很多書。他撰作了一本名為「農民經濟分化問題」的書籍，在這本書中很不恰當地援引了馬斯洛夫（孟塞維克，寫了許多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列寧與馬斯洛夫曾有過很多的爭論）的話，在觀察問題時有幾個不正確的解釋。列寧就給波里斯·克尼玻維奇寫了一封長信，但這封長信當時遺失了；於是列寧又把這封信重寫了一遍。信是用「親愛的同事」這幾個字來開頭的。一開始就讚揚說：「我很快樂地來閱讀了你的這本書，並很高興的看到，你寫出了這樣富有內容的著作。在這樣著作中來檢查，加深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大概是會完全成功的」。非常之小心的來說，但還是說出：要盡可澈底地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其次又說：「在數字的行列後面有時是否會把各種類型，各種社會經濟底經營類型（般實的主人——資產者；中等的小經濟主人；半無產者，無產者）忽略過去呢？」評註是用問題的形式提出的。因為這樣一來作者就不能不瞭解責難底嚴重性，所以列寧就立即盡力地來解釋錯誤底根源。由於統計材料本性所在，這個危險是很大的。「數字的行列」是很誘惑人的。我勸作者估計到這一危險；我們的「教授們」一定會這樣來窺息這些材料之活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克尼玻維奇在大學裏是在杜于一巴朗諾夫斯基領導下的研究組中工作的。——克魯普斯卡婭註）。在數字的行列中來沈沒階級鬭爭。作者是沒有這點點的，但在他將開始作的這一巨大著作中；是須加倍地估計到教授們，自由派和民粹派之這種危險和這種「路線」的。估計到並當然要截斷它。後來又講到

斯洛夫夫。『末了，爲什麼 *Deesse x machina* (突然。——克魯普斯卡婭註) 出現了馬斯洛夫夫。Суп? Q. gonoto? Quibus auxiliis? (註) 須知他的理論距馬克思主義是相隔得太遠。民粹派稱他爲「批評家」(等於機會主義者) 是正確的』。於是他又以問題的形式來給作者以自新之路。『作者是否是偶然相信了他，也許是這樣吧?』往下就作結論說：『這不過是我在閱讀這本有興趣和富有內容的書時所發生的一些意見而已。僅向你握手，並祝工作上的成功』(『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五一〇至五一頁)

依里奇就是這樣來培植青年作者的。依里奇之這一全部巨大的編輯工作——口頭的，有大半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記載下來的。而這樣的工作却是很大的。依里奇很關心於『馴養作者』。他力圖一定要登載那本來應該吸收來參加工作的作者底文章。

列寧對我也應用了同樣的教育方法。當我在放逐期中第一次寫『女工』這本小冊子時，列寧供獻了極多的意見。依里奇比我先行出國，並把『女工』這一小冊子的手稿也一同帶去了。後來他從慕尼黑在用化學藥水寫來的信中說，『火星報』編輯部決定秘密出版這本小冊子，並通知了查蘇里奇對它的批評。查蘇里奇很喜歡這本小冊子，據他的意見。某些地方，本應用另一種方法來描寫，但她却說，這本小冊子是『寫得頂呱呱的』。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向我供獻意見時，也像同其他初起作家那樣的來同我談話：『你是否覺得，這個地方要這樣說才好些呢?』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知道我要寫什

(註) 爲什麼? 怎樣的? 用什麼方法? ——譯者註。

慶問題時，常替我找到某些有趣的材料——從外國報紙上剪下來的材料，統計表等等。然而，從前，在一九一七年前，我是很少寫作的。例如我竟至連一篇文章也沒送到『真理報』上去發表。

列寧認為吸引工人作者參加寫作有極大的意義。他在出國之前，就同巴布石金（涅瓦卡附近的五金工人）商議好了，要他給『火星報』通信，並徵求工人通訊員和作者。我當時流放在烏發，也來徵求工人給『火星報』通信。『火星報』底其他代辦員也這樣作。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曾寫信給從前在紡織廠作染匠，當時（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住在敦倫，準備回俄的諾根同志，要他務必與『火星報』發生最密切的關係，組織通訊小組（現在叫作隊）給『火星報』傳達消息。

依里奇在致諾根的信中說，『你與我們合作，我們對此抱有極大的希望，尤其是在與各地工人發生直接聯系的事業上。你是否樂意這種工作？你不反對巡視麼？——大概，這個工作是要求經常巡視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六八頁）。

我記得，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對每一工人通訊是如何地表示高興。編輯部在慕尼黑的這一部份人，即馬爾托夫和查蘇里奇也是與列寧同歡共樂的。他們閱讀了並反覆地閱讀了工人的通訊。這些工人通訊通常是用當時先進工人們所說的那種特殊語言來寫的。在他們語言中有大批的新辭句和新術語，但他們在應用這些言辭和術語時，常帶着一種特殊的和不正確的色彩，不正確的綴連法。這些工人的通訊須加以修改。列寧很關心這件事情。他很關心於保存這些通訊底精神，體裁和特點，使它們不至失掉其彩色，不至過分地知識份子化，而保存其本來的面目。這個工作大部份也是由我來擔任的，因為關於修改工人文章的問題，我已具有某些經驗了，這些經驗，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卡附近星期

夜校裏工作時獲得的，在那裏我一共工作了五年。列寧對我的修改都檢閱過。

當時先進工人的語言是令當地許多工作人員所很不滿意的。他們給我們送來的通訊並不是原稿，而是已經「修改」過的，由於修改的結果就常把通訊中最主要的東西都剝割掉了，並塗去了它們的工人面貌。列寧常對這種行為表示憤怒，並堅持要與工人建立直接的關係。各地方組織常藉口於寄信遭受破獲，很不樂意來寄發工人的通訊。

列寧如何重視與工人直接發生聯繫的問題，這是可從他在一九〇二年六月十六日寄給拉勤科的信中看得出來的。他在那裏寫道：

「親愛的朋友：我很高興與你關於與工人進行談話的通知。我們是極難接得這樣的信件的，這樣的信確會給我們很多的快感。請你一定把這點轉告給你們的工人，並轉告我們對他們的請求，要他們自己已給報紙通訊，也給我們通信交換意見。以便互相間不至失掉聯系並保持相互的瞭解。這裏我特別注意工人們對「做什麼？」一書的意見，因為工人們關於此書的批評我還沒有接到。

總之，就請你把你所領導的工人小組，以及滿尼亞（工人委員會，當時在彼得堡存在有兩個黨委員會，一個是工人的，我們在信中就把它叫作滿尼亞，另一個是知識分子的，我們就把它叫做萬尼亞。——克魯普斯卡婭註）直接同我們聯系起來吧，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能鞏固他們與「火星報」的接近，以及你在他們中間的地位的。然後，如果從滿尼亞的領袖中有真正能幹的人物，最好從他們中間找一個人到我們這裏來，請把這個意思轉告他們，並同他們商量商量，看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怎樣」（『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一四二頁）。

但列寧不只是想從工人那裏得到通訊，而且還想工人給「火星報」寫文章。我受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底委託給巴布石金寫了下面這封信（我們很知道他；巴布石金曾在星期夜校中我教課的那一班裏學習過，同時又在列寧所領導的小組上聽過課）：「我們向你有個請求。請你在圖書館裏給我們找一份『俄國財富』雜誌（從去年十二月份起）吧。因為有個名叫多童諾夫的，曾在該雜誌上寫了一篇很使人憤慨的關於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裏竭力把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描寫為一些仇視任何團結，沒有任何需求和意向的人。謝斯鐵爾寧在雜誌上反駁了多童諾夫。但多童諾夫又寫了一篇更為使人憤懣的文章，於是『俄國財富』雜誌就聲明停止在該雜誌上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你讀讀這些文章吧（如果需要的話，那就給我們買幾期我們所需要的一俄國財富雜誌，由我們出錢），並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或短評（我在信裏寫的是『短評』，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閱信時，却補上：『文章或短評』。——克魯普斯卡婭註），盡可能收集實際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在『火星報』（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却補充說，『或『曙光』雜誌』，他想在厚本的科學雜誌上發表工人的文章）或『曙光』雜誌上登載一篇很知道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依里奇在『工人』二字下畫了三條着重線。——克魯普斯卡婭註）反駁這種無稽之談的文章」。巴布石金寫作的這篇反駁文章編成了整本的小冊子，並以附錄的形式在一九〇一年十月第九期『火星報』上，用「擁護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的標題，——署名為「工人擁護工人」，——而發表了的。

列寧就是這樣的來徵集工人通訊員和工人作者的。當時的條件很困難，這一工作曾要求極複雜的通信，要求調整秘密的交通，當時的工人通訊員和作者還只是不多的幾個人。隨着運動的發展，他們

的數目也增長起來。使依里奇抱着無限的喜悅。現在，工人通訊員已是一個強大有力的軍隊了。

(四) 列寧與「真理報」。

一九二二年五月「真理報」開始出版，並已感覺到一定的革命高潮，於是整個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就在七月初從巴黎遷移到了接近國境的克拉科夫，因為在那裏可以經常地與俄國同志們見面，並能更直接地來領導革命運動，經常地來給「真理報」和「明星報」寫作文章。與「真理報」的關係在頭一個時期並沒有調整好。

「真理報」並不是一下子就確定了自己的地位的。它曾是工人的報紙。究竟如何來選擇那與工人羣衆緊相聯系的公開日報的主題呢？如何發揮它們呢？羣衆已不是一九〇五年時候的羣衆了，但能否同他們去討論一切複雜的純粹是黨的問題呢？羣衆是否瞭解呢？是否只在供黨工作人員和更覺悟的上層工人用的「明星報」上討論黨的問題要好一些呢？這還是尚未解決的問題，編輯部還沒有來解決它，然而時間是不等待的。上面我已引證了依里奇對那些應在工人報上加以討論的主題性質之觀點。他認爲，應與工人羣衆討論他們所注意的一切黨的問題。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對「真理報」之不與取消派作鬭爭，很爲表示焦慮，而這一鬭爭因選舉運動臨近而更加必要了。

依里奇在其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說：「我們按經驗就知道，我甚至對你們爲避免書報檢查起見所作的種種修改都是帶着極大的忍耐的。但根本的問題却要求直接的回答。編輯部是否打算在

選舉運動裏反對取消派，彰明準確地來稱乎他們，抑或不想這樣作，這是要讓同事知道的。沒有中間的道路。而且也不能有中間的道路。如果文章（列寧寄給『真理報』的『論選舉政綱』的文章。——克魯普斯卡婭註）『無論怎樣都必須發表出來』（編輯部書記這樣寫道），那又如何來瞭解維提木斯基（註）（『真理報』編輯之一。——克魯普斯卡婭註）所說的『憤怒的音調是有妨礙的』這一句話呢？試問反對惡劣的、有害的、不正確的東西（須知編輯部『原則上』也是同意的哩！）的憤怒音調，怎麼能妨害日報呢？』（『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七三頁）

『論選舉政綱』的文章終究沒有發表出來。於是依里奇在寄發下一篇名為『半年工作總結』的文章時，就提出最後通牒說：或者完全發表，或者原稿交還。然而這些意見分歧，並沒妨礙他看到創立『真理報』的全部巨大意義。他在『半年工作總結』一文中劈頭就說：『彼得堡工人創立了工人日報，就算是作了一件巨大的，——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歷史事業』（『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四五頁）。這篇文章再好不過地指明了，依里奇如何來注視『真理報』的工作，如何來注視工人對『真理報』的關係，工人羣衆對『真理報』的贊助如何使他高興。這篇文章是在『真理報』第七八、七九、八〇、八一等期上陸續發表了的。

問題是終於照列寧的意見解決了，依里奇寫給編輯部的下一封信（九月八日）就已柔和得多了。

（註）就是米·阿里敏斯基。——譯者註。

「讓我利用這個機會，——他在這封信中寫道，——來祝賀維提本斯基同志（煩你們把這封信轉給他）發表在我今天所接得的這期（第九十八期）『真理報』上的一篇好文章吧。主題是選擇得極恰當的，而且作得很好，形式又極簡單明瞭。有時在『真理報』上一般提到，引證和解說謝德林以及其他人的『舊』民粹派民主主義作家，那是很好的。對『真理報』讀者——二萬五千讀者——這是恰當的、有趣的，而且還會是從另一方面，用另一種替調來闡明現代工人民主主義的問題」（『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七四至七五頁）。九月十二日斯大林來到了彼得堡，並開始幫助『真理報』來實行正確的黨路線。

，列寧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每篇文章都是——直接或間接——號召組織和行動的。『半年工作總結』一文就是號召在『真理報』周圍廣泛地組織起來（每次領新時捐給『真理報』一個哥比）。『真理報』第九十六期上的『不好的捍衛』一文，就是間接號召用混工的方法來為提高工資而鬥爭。在第九十九期上『取消派與一統一』一文又號召團結於『真理報』周圍。第一〇五期上的『在瑞士』一文，是間接號召去與機會主義作鬥爭；第一一八期上的『關於波良斯基底信』，是號召農民向『真理報』寫關於土地問題的意見，按僱傭工人與破產農民聯合的道路前進。第一二〇期的『美國工人的成功』一文，是間接號召入黨和聯合於『真理報』周圍。第一三四期上的『賭博』一文，是反對佔他國土地；第一三六期上的『米留可夫先生底立場』一文，是號召工人去獨立活動，去與特權鬥爭，劃除在社會生活中去與舊勢力妥協等等等（註）。依里奇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是有巨大的組織意義的，它們興奮鼓舞了羣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致『真理報』的信中，對

「真理報」沒有及時登載彼得堡工人授予自己工人代表的委託書一事表示憤怒，要求立即將其翻表，並寫道：

「如果工人報紙以這樣一種怠慢態度對待工人所注意的問題，那它還能存在麼？」往下又說：「報紙應當自己尋找，按時找得和按時登載相當的材料。報紙應當尋找和找得它所必需的聯系。而這裏忽然那由贊助「真理報」者方面所擬製的彼得堡工人授予自己工人代表的委託書，在「真理報」上却沒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七八頁）。

斯大林出國後，「真理報」的種種舊病又發作了。甚至很難弄明，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但依里奇却覺得編輯部對待國外的人們是在「暗地裏仇視」。依里奇認為，必須改造編輯部，必須派遣一個很有黨工作經驗的編輯到那裏去，專門擔負這一工作，否則在編輯部裏誰擔負什麼工作，就完全不明白，因而就發生一種無人負責的現象。如果注意到那搗亂全局的馬林諾夫斯基在那裏所起的作用，就完全是可以瞭解的了，而馬林諾夫斯基的奸細行為，當時還無人知道。一九一三年二月初，在克拉科夫舉行了會議，這次會議有斯大林參加，依里奇同他詳細商定關於改組「真理報」領導的問題。預定了把剛來到此間的斯維爾德洛夫作為實際上的編輯。在依里奇對「真理報」問題之所以這樣表示焦急，是因為他認定「真理報」有極大的意義。依里奇在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致斯維爾德洛夫的信中說：

「……目前主要的關鍵是在「叢報」（「真理報」的暗號。——克魯普斯卡婭註）及其如何辦理的問題。我們在這裏不能達到改良和正確的辦理，那我們就會走到物質上和政治上的破產。「叢報」是團結和提高運動所必需的組織工具。只有經過這個工具，那隊所規畫的人力，資料才有必要的必

源。彼得堡的情形不好，這主要是由於「畫報」辦得不好，由於我們不善於利用「畫報」或當地「編輯」同人從中妨害所致」。往下又說：「我再三再四地指出：全部局勢底關鍵是在於『畫報』。這裏能够取得勝利，那時（只有那時）才能調整地方的工作。否則就會全部倒台」。

從這封信裏可以看到，當時依里奇把『真理報』看得多麼重大。斯維爾德洛夫集中全力來編『真理報』。依里奇在二月會議上與斯大林詳細商定了關於改組『真理報』的問題。斯大林回到俄國後就立即着手改組，但斯維爾德洛夫即於舊曆二月十日在杜馬代表彼特羅夫斯基同志家裏被捕了，因而全部改組計劃都受到阻難，再過十二天後——二月二十二日——斯大林也被捕了。然而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矯正了『真理報』的路線，它已大膽地來說話了。七月，『真理報』被封閉了，於是就出版了『工人真理報』。此後，又改為『北方真理報』，再後又出版了『勞動真理』，末後，又出版了『擁護真理』，『無產者真理』，『真理之路』，『勞動真理』等報，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前，『真理報』就完全被破壞了。『真理報』被奸細全部包圍了。莫斯科代表馬林諾夫斯基，這個很好知道『真理報』情形的奸細，與『真理報』很爲接近。另一奸細——切爾諾馬若夫成了『真理報』的書記。『工人真理報』的出版人——蘇爾堪諾夫也是一個奸細。雖有過這樣的包圍，但『真理報』終於達到了目的，組織了工人羣衆，喚起了他們的思想，鼓舞了他們的毅力。順便的說說，依里奇還在九一三年四月致『真理報』信中，就已寫過社會主義比賽問題了。

（註）上面所列舉的那些文章，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譯者註。

「必須逕直在各工廠進行擁護『真理報』的鬭爭，——他寫道，——要求大家多多訂購『真理報』，要把每個工廠從『光線報』（孟塞維克的報紙。——克魯普斯卡婭註。）手中奪過來，使各工廠在擴大訂購『真理報』人數上進行一種比賽（着重點是我所加——克魯普斯卡婭註）。黨性底勝利就是『真理報』底勝利，反之亦然。要掀起這種運動。把『真理報』從三萬份擴大到五萬至六萬份，把訂報人從五千擴大到兩萬人，並向這個方向堅定不移地前進，而那時我們就能擴大和改善『真理報』」（註）。

我記得，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是如何注意工人積極參加贊助『真理報』的問題。有次他向『真理報』編輯部索取全體訂報人名單，爲了查明訂報人底分佈情形，即爲了查明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工廠，在什麼城市和什麼工人村落訂報的人數最多等，使我耗費了很多晚上的工夫。結果得到了一幅很有趣的圖畫，我根據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指示來整理了這個材料並將其寄給了『真理報』，但這篇文章，顯然是被切爾諾馬若夫塞進字紙簍裏去了，所以沒見發表出來。

一九一四年五月五日『真理報』第二週年紀念。這天變成了『刊物節日』。除『真理報』外，還有十七種刊物紀念了這個節日，作了兩年工作底總結。『真理報』的戰鬥工作把工人羣衆團結在它的周圍了。報紙存在的次年，就接得了一萬二千一百一十四個工人通訊，到節日爲止，獻給『真理報』的基金，就有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個盧布，其中有一萬八千五百八十四個盧布完全是由工人捐給的。

『真理報』的第二週年紀念指明依里奇所如此堅持的道路是何等的正確，指明『真理報』享有何

等的威信。

戰爭到來了，「真理報」被摧殘了，工作人員被捕了。它只是在二月革命後才恢復了自己的工作。

列寧對「真理報」十週年紀念寫道：

「：在俄國出版的布爾塞維克日報已十週年了：從此時起祇過去了十年！但按這一時期底鬭爭和運動底內容來講，却等於過了一百年」。

「：公開的布爾塞維克「真理」日報十週年紀念明顯地向我們指出偉大的世界革命之大大加速的進程路標之一。沙皇制度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似乎完全粉碎了革命。布爾塞維克黨却善於在幾年之後就衝進了——用另一種形式和另一種方法——敵人的內城，並每日每時公開地從內部開始來做爆炸萬惡的沙皇地主專制制度的工作。再過幾年後，布爾塞維主義所組織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

在一九〇〇年組織舊「火星報」時，參加者不過十來個革命家。當一九〇三年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的秘密代表大會上產生布爾塞維主義時，約有四十個革命家參加了這件事情。

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公開的布爾塞維克「真理報」誕生時，已有幾十萬的工人贊助它了，這些工人用自己一個哥比的捐款就既戰勝了沙皇制度的迫害，又戰勝了那些叛賣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即孟塞維克的競爭。

(註) 見「明星報和真理報時代的文件」，第三頁，第二三三頁。——譯者註。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立憲會議底選舉運動中，三千六百萬選民內就有九百萬人投票贊成布爾塞維克。其實，問題並不在選舉，而是在鬭爭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末和十一月布爾塞維克已得到無產階級和覺悟農民中的大多數擁護，這是說全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中的大多數代表，勞動人民最積極最覺悟部份，即當時一千二百萬軍隊中的大多數擁護。

這就是最近二十年來世界革命運動之加速進程底一張小小的數字圖畫。這一極小和極不完全的圖畫却把總共有一萬萬五千萬人民底歷史大概表現出來了。

「國際資產階級暫時還仍舊比它的階級敵人要強得無可比擬。這個資產階級會竭全力阻撓分娩，使俄國無產階級降生的危險和痛苦增加十倍，並且還能用白匪和帝國主義的戰爭等來使千萬人民經受苦難和瀕於死亡。我們是不應忘記這點的。我們應善於把自己的策略上與目前實際情況底這一特點適應起來。資產階級暫時還能自由地來折磨人凌虐人和屠殺人。但要來阻止不可避免的——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行將到來的革命無產階級之完全勝利，則是不可能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二至二九五頁）。

今年，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舊曆四月二十二日），我們將慶祝『真理報』二十週年紀念。我們希望它在這個工作中的成功，希望它儘可能深刻和完備地去發揮依里奇底規範。讓我們幫助把我們所有的刊物，黨的刊物堅定不移地提到列寧所要求的高度吧。

工人刊物的組織作用

我們從很早的時期——從一八六一年農民改良以前以及農民改良以後的時代來講起吧。當時在公開的刊物上是沒有可能來說一句真話的。刊物簡直是一種「奴隸式的」。列寧寫道，「蓋爾村在國外建立了自由的俄國刊物——這是他的偉大功績。「北極星」報發揚了十二月黨人底傳統。「警鐘報」（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七年）曾高倡解放農民。奴隸式的緘默是被衝破了」（『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四六六頁）。當時『警鐘』對俄國先進知識份子的影響是極強烈的。蓋爾村是「民粹派」底創始人。他的民粹派理論是錯誤的，但他瞭解羣衆底意義，他大膽地來號召反對沙皇制度，反對逮捕革命家，反對蹂躪波蘭。列寧同志在一九一二年寫道，「當整羣俄國自由派因蓋爾村主張保衛波蘭而與他疏遠，整個『文明社會』都與『警鐘』斷絕關係時，蓋爾村一點也不驚動。他仍繼續堅持波蘭底自由而來駁責亞歷山大第二發縱指使的鎮壓者，劊子手和絞殺者。蓋爾村拯救了俄國民主底榮譽。他在致屠爾格涅夫的信中說，「我們拯救了俄國底榮譽，因而我們就遭受了奴隸式的大多數的迫害」（『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四六七頁）。

●『我們紀念蓋爾村，就顯然看到在俄國革命中行動的三代人和三個階級。起初——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和蓋爾村。這些革命家是範圍很狹的。他們與人民間的距離是極遙遠的。但他們的事業並

沒有落空。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蓋爾村。蓋爾村則展開了革命的鼓動。

從契內舍夫斯基直到「民意派」英雄止，這些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則把這革命的鼓動事業接收過來，並把它擴大了，鞏固了和鍛鍊了。戰士們底隊伍擴大了，與人民的聯繫也更形接近了。蓋爾村稱他們為「將來暴風中的青年舵師。」但這還不是風暴的本身。

風暴，這是羣衆本身的運動。無產階級——惟一澈底的革命階級，起來領導他們了，破天荒第一次把千百萬農民引上公開的革命鬪爭道路。風暴的第一次襲擊是在一九〇五年。下次的襲擊也就在我們眼前開始生長起來」（註）（『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四六八至四六九頁）。

「警鐘」傳播於奴隸國家的「自由的俄國言論」，並不是白白響叫了的。列寧在青年時代以及與他同代的人們都是酷愛閱讀蓋爾村著作的。當列寧已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找到革命鬪爭正確道路時，極想公開地同羣衆講話，把真理告訴他們。一九〇〇年也像蓋爾村時代一樣，是不能公開地經過合法報紙來向羣衆講話的。另一方面，當時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面前有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模範例子，後者在那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非常法律施行時期在瑞士組織了自己的秘密機關報，並善於很好地將其運入德國（紅色郵政）。列寧，頗特列索夫和馬爾托夫估計到自由言論的巨大意義，估計到全俄政治報紙的組織意義，就到國外去協同「勞動解放」社組織了「火星報」。究竟列寧認爲報紙在組織方面具有何種意義，可從他在「火星報」第四期「從何着手？」一文中看出來。

他在那裏寫道，「末了，我們一定要有政治報，沒有政治機關報，那在現代的歐洲就不能有值得稱爲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機關報，那我們把一切政治上表示不滿和表示反抗的份子集中起來，

用他們來滋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任務就決不能執行。

我們已經作了第一步，我們已在工人階級中激起了在工廠內作「經濟」揭露的熱情。我們現在應當作第二步：要在一切多少有些覺悟的人民階層中去激起作政治揭露的熱情……

「俄國的工人階級與俄國社會其他階級和階層不同，它對政治知識發生不斷的興趣，對秘密刊物是經常（而不僅在特別激動的時期）有很大的需求。在大批需求秘密刊物的條件下，在已開始培養有經驗的革命領導者的條件下，在由於工人階級底集中化使工人事實上成爲大城市工人區和工廠區主人翁的條件下，——創辦政治報紙是無產階級完全能够負擔的事業。而經過無產階級的報紙可以深入

到城市平民，鄉村手藝業者和農民中去，成爲真正人民的政治報。

可是，報紙底作用還不僅限於傳佈思想，不僅限於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上的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在後面這一點上說來，我們可以把它比作造房子時的大木架。木架搭在建築着的房子底周圍，形成房子底輪廓，促進各匠人間的聯系，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考察用有組織的勞動所達到的總成績。在報紙底幫助和由於有報紙的情形下，自然也就會形成經常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要做地方的工作，而且要做經常的一般的工作，如教導自己的組員留心考察政治事件，估計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人民中各階層的影響，規定革命黨去影響這些事件的妥善辦法」（『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一一〇至一一一頁）。

（註）論蓋爾村一文是在一九二二年寫的。——克魯普斯卡婭註。

列寧還在先前早就從放逐處寫道：「只有建立一般的黨的機關報才能使革命事業底每一『個別』工人『感覺到，他是與其他的同志『並駕齊驅的』，他的工作是黨所直接需要的，他是用來勒死俄國專制政府——即俄國無產階級和全體俄國人民最兇惡敵人之鎖鏈的一環」」（『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五二四至五二五頁）。

我們知道『火星報』在組織黨和組織革命運動事業上是有何等巨大的意義。

『火星報』認爲工人通訊和吸收工人參加報紙的寫作工作其意義特別重大。『火星報』之『代辦員』，即幫助『火星報』之出版，轉運和散佈的人們，也應關心到吸收新的通訊員。彼得堡的工人巴布石金在這方面算是最多了。他巡視過許多工人區域，從奧列哈沃·祖也沃，雅羅斯拉夫里，叔雅，古西·黑魯斯塔里內以及其他等地工人中收集了許多通訊。他於一九〇六年被槍決了。

當『火星報』（一九〇三年）轉到孟塞維克手裏後，波爾塞維克就於一九〇四年末出版了自己的報紙——『前進報』，該報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後就改名爲『無產者』。

一九〇五年就可能出版公開的報紙了。第一個明目張膽地擁護波爾塞維克觀點的公開報紙就是『新生活』報，它在莫斯科起義時遭受封閉，但後來又在『浪潮』，『回聲』等名義下恢復工作了。這些報紙的意義是很大的。如果估計到列寧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這時期內，只能在帕寧納公所內舉行的工人羣衆大會上作過一次講演，那就顯然知道，當時一個公開的波爾塞維克報該有多大的意義。

工人羣衆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時期內是贊助波爾塞維克的。

到反動年代又進到了秘密環境，中央機關報又成爲秘密的了。

當工人運動剛開始復興時，在第三屆杜馬代表，主要是坡列塔也夫的幫助下始得在一九一〇年末把出版『明星』週報的工作辦理就緒。一九一二年就已開始出版『真理』日報了。當時波爾塞維克底國外中心爲便於同國內聯絡起見便移到了鄰近國境的克拉科夫。

工人們捐款給『真理報』。列寧仔細地考察過，究竟是那些工人組織給『真理報』捐了款，並認爲這是有重大意義的。列寧之所以重視工人的贊助，不僅因爲這種贊助能使報紙繼續存在，而且還認爲這點有極大的組織意義。他甚至規劃了一種特別捐款形式：『一個工人哥比』。根據這個草案，同情『真理報』的工人，在領工資那天都捐出一個哥比。按哥比的數目就能知道同情『真理報』的有多少工人。然而，當時，一九一二年，由於職工會和黨組織的薄弱，這個計劃終未能實現。

在大戰以前的『真理報』是供誰閱讀的呢？

依里奇住在克拉科夫時，會請『真理報』社將訂報人名單寄給他。現在，當『真理報』已有幾十萬訂報人時，這樣來做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九一三年，這些訂報人的數目只不過幾千人。訂報人的名單是寄到了。按依里奇的計劃就把這些名單剪開來並分成各組。如果先前已可看到，『真理報』底主要訂購者是工人，那末經過這番工作後，這點就更其顯然了。絕大多數訂報人，是散處俄國各地的工人。調查所得並加有相當說明的數字材料，是寄給『真理報』去了的，但這材料却落到奸細切爾諾馬若夫手裏，而被他塞進字紙簍去了。

但工人不只是『真理報』的訂購者，而且還給『真理報』寫文章。『真理報』非常注意工人的通

訊。

當一九一七年十月權政已轉入蘇維埃手中，並在羣衆參加下開始建設新生活時，工人刊物的任務就大大地加深了——它不僅要喚醒政治覺悟，不僅要做政治上的揭露，它的基本任務已是幫助組織新秩序，並在新的基礎上來改造全部的生活了。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真理報』上論過渡時期的共產主義刊物一文裏寫道：『資本主義把報紙作爲資本主義的企業，作爲富人們發財致富、開心取樂、爲他們通報消息底工具，而對勞動羣衆說來，則是欺騙他們和愚弄他們的工具。我們粉碎了這個發財致富和欺騙的工具。我們開始把報紙作爲啓蒙羣衆和教育羣衆的工具，即教育他們在沒有地主和沒有資本家條件下來過活和建設自己的經濟。但我們還剛才開始作這件事情。三年多的光景作得並不多。還要作很多的東西，還得經歷極遠大的路程。少作些政治上的喧嘩，少作些那沒有經驗、沒有瞭解自己任務的共產黨員用以取樂的一般議論和抽象口號，多作些生產的宣傳，而主要的是切實地、技巧地、適應於羣衆發展水平來估計實際經驗』（『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五至一六六頁）。

改造現存的各種制度是在羣衆最積極的參加下來進行的——羣衆很快地也就認識了，工人刊物該有多麼巨大的組織意義。工人刊物依據着工人通訊員就揭露了各種紛亂情形和不法行爲，幫助了在實際上來實現工人羣衆的監督。工人通訊就很快地發展起來了。

設法組織工人通訊，幫助其正確地發展和綜合工人通訊底經驗就成爲當前急務了。於是『真理報』又着手來進行這一工作。『真理報』出版了『工人通訊員』雜誌。『真理報』組織了工人通訊員

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其他報紙也照『真理報』的辦法來作。工人通訊是我們蘇維埃國家底特產。羣衆所進行的巨大建設工作，乃是發展工人通訊的條件。隨着工人通訊的開展，鄉村通訊也發展起來了。鄉村比城市要黑暗得多和閉塞得多。那裏的髒濁事件是不少的。鄉村通訊開始來激動鄉村了，就在刊物幫助之下把一切黑暗的、野蠻的和非法的事件完全揭露出來。當然這些揭露對於揭露者說來並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被揭露者會對鄉村通訊員屢施報復：暗殺，用各種方式來報仇。而『真理報』在爲捍衛工農通訊員的事業中又作了不少的事情。

、『真理報』從一九二四年起出版了『工農通訊員』雜誌。

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工農通訊員已有二十萬以上了。刊物的組織作用，大概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像在工農通訊運動中表現得這樣明顯。運動日益擴大起來了，各編輯部周圍佈滿了通訊員網，組織了工人通訊員和鄉村通訊員的小組、研究班和學校。工農通訊工作的質量改善了，通訊的取材敘事也更爲深刻了。這是個巨大而森嚴的運動。向着正確軌道前進的工農通訊運動就形成了實現依里奇所寫的「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底前提。工農通訊運動教育羣衆來實行這個監督，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這個監督是教羣衆從社會觀點上，從公共利益的觀點上來估計各種現象。

工農的通訊不僅帶着並應帶着揭露的性質，而且它們還應來反映各種好的方面，並把羣衆在日常生活中所創造出來的新東西表揚出來。當然，這類性質的通訊，並不比帶揭露性質的通訊的價值少，它們綜合着，組織着羣衆的首創性。這是非常重要的。

現代工農刊物底規模，較之從前，却完全不同了。報紙已成了生活的組成部份。現在已有每家鄉

領到一份報紙這樣的鄉村，誠然，這樣的鄉村並不多，但五家十家共領一份報紙的鄉村，却已經很多了。現在出版了很多中央報：「真理報」，「新聞報」，「勞動報」，「汽笛報」，「貧農報」，「農民報」等等。此外，還出版了很多的地方報紙，這些報紙的組織意義並不比中央報紙的組織意義小。地方的報紙還能深入實際生活，還更能接近讀者，還更能使他們參加報紙的工作，這種報紙也就更深入羣衆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報紙都善於做到這點，某些地方報紙只是力圖模倣中央報紙罷了。

實際生活使報紙更加個別化。於是牆報廣泛地發展起來。牆報又更加接近讀者，更加是迫不及待的東西了。誠然，牆報有時不是沿着正確道路前進，不是從事於估計周圍現象，而是從事於一般的評論。但不管怎樣，牆報工作終於發展起來。

可是重要的不僅是使報紙編輯得很好，而且還要廣泛地和正確地分發出去，使讀者能按時得到報紙，充分地利用報紙和善於利用報紙。

列寧在以上那篇發表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真理報」上的文章裏，對報紙的不正確分配非常憤激，因為報紙沒有發行到羣衆中去，而停滯在各種蘇維埃時代的官僚手裏。他建議要特別注意報紙的張貼工作。他建議首先要供給農民閱讀室和圖書館作張貼用的報紙，用這樣的方法把報紙傳到工農羣衆中去。這篇文章寫出來已經五年了。我們在供給工廠和鄉村報紙的工作上，已得到了某些進步。每個工人通訊員和鄉村通訊員都來注意報紙的發行工作。三四年前還有過這樣的情形，例如在烏拉爾，訂報的工作。是經過一個什麼代辦所來作的，這個代辦所錢是收了，但沒有去組織發寄報紙的工作，

結果連圖書館也得不到它所訂購的報紙。現在這早已是過時的事了。現在只一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出版的『農民報』就已有十四萬訂戶了。在鄉村散佈報紙工作上盡力量最多的要算循環郵政了。

在利用報紙方面是還作得極不充分的。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在某一工廠中差不多每個工人都訂購了報紙，但讀報的人却很少，在宿舍內並沒有組織讀報的工作。關於張貼報紙的工作作得更壞——這個工作差不多沒有作，在這方面是還須得作很多工作。保存報紙的工作也作得不好，在保存有報紙的地方，却放着沒有去利用，沒有成爲一種閱讀的材料。對裝訂好了的報紙必須按題目來擬定一個目錄。例如平茲出版的『教育』雜誌，每期（月刊）都載有當地報紙在上月內關於該邊疆問題所發表的文章目錄。當然，關於其他的問題，也可以並且應當編製這樣的目錄。對按月裝訂了的報紙再加上這樣的一個目錄，就可把報紙變成極爲有趣的參考材料和閱讀材料。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常說：『我們還不善於來利用我們已有的那一點東西』。我們要學習更好地和更完善地來利用報紙。

現在有無線電新聞來幫助報紙的工作。無線電新聞的意義是會不斷地增長起來的。地方無線電新聞在進行組織工作方面會有很大的意義。它們在省執行委員會手裏能成爲直接與羣衆發生關係，向他們解釋每種設施，每個決議的有工具。我們還沒有學會利用無線電來組織人民。我們必須學會這點。

列寧論善於寫工農羣衆讀物的技能

列寧從西伯利亞放逐處寫給國外阿克雪里羅得的信中說，「我最願意，最希望的，就是有寫工人讀物的機會」（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的信，『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頁）。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還在一八九七年以前就已經在寫工人讀物了。

一八九五年，他爲工人寫了一本標題爲『關於工廠科收工人罰金的法律之解釋』（註）的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是於一八九六年在拉黑金斯卡婭印刷所中秘密印行的。

在一八九五年，彼得堡社會民主黨人團體，——後來以『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鬪爭協會』得名，參加這個團體的有列寧，克爾什尙諾夫斯基，斯達爾科夫，拉動科，瓦涅也夫，謝爾岡和雅庫坡娃等人，——會決定出版一種供工人閱讀的秘密雜誌——『工人事業』。正當第一期準備就緒時，就發生了逮捕案，本期原稿就從瓦涅也夫家裏搜去了，所以這期雜誌終未刊行出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會替該雜誌寫了一篇標題爲『俄國總長們想些什麼？』的文章。

列寧從獄中寄出了化學藥水寫在某本書上專供工人閱讀的兩篇傳單：「五一工人紀念節」，「告

（註）『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六三頁。——譯者註。

沙皇政府」。

阿克雪里羅得和普列漢諾夫對依里奇這本名為「罰金法律之解釋」的小冊子，給了很高的評價。依里奇在一八九七年八月十六日致阿克雪里羅得的同一信中說道：「你和他（普列漢諾夫。——克魯普斯卡婭註。）對我這個小小著作嘗試（爲工人寫作的嘗試）的評價使我快樂無限」（『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十七頁）。

希望學會寫廣大羣衆易解的作品青年作者，須仔細地來研究依里奇的這些著作。

只要把關於「罰金法律之解釋」的小冊子拿來考察考察，那就可看到，這本小冊子是用極普通的語言寫的，但同時我們又可看作，這本小冊子與那些在目前還如此盛行的膚淺宣傳，實有天淵之別。在小冊子裏完全沒有鼓動的辭藻和號召。但主題底選擇本身上就很恰當。這是個當時最使工人焦急和有關工人利益的題目。這本小冊子是從工人所熟知的具體事實出發，完全按仔細收集來的大批材料底事實作根據，事實的敘述又極爲明顯。在小冊子內所講到的，拿來說服人的，並不是空話，而是具體的事實。這些事實竟至說得這樣明顯，這樣令人信服，使工人認識這些材料後，就能自作結論。小冊子底計劃是仔細地思索過的，它從各方面來闡明問題；這個計劃是歸結於下列幾點：（一）什麼是罰金。（二）先將怎樣實行罰金和關於罰金的新法律是由什麼所引起的？（三）根據什麼理由廠主可以罰款？（四）罰金數目能有多少？（五）實行罰金的手續如何？（六）按照法律，罰金應當作何用途？（七）關於罰金的法律是否推行於全體工人呢？（八）結論。

在結論裏祇是簡單地把工人自己已從本小冊子的前幾章引來的事實所作出的那些結論概括起來，

祇是幫助去綜合和最終擬定這些結論。這些結論是很簡單的，但對工人運動却有極大的意義。

列寧在「俄國總長們想些什麼？」這一簡短論文中其對讀者的態度也像在「罰金法律之解釋」內一樣。他把內務總長杜爾諾沃致神聖教會最高理事會檢察長頗別多諾斯柴夫的信，拿來加以分析，並引起工人來做如下的結論：

「工人們！你們看吧，我國的總長們是怎樣對於知識與工人們的結合害怕得要死呵！證明給大家看吧，任何力量是不能夠奪去工人們的自覺的！工人們沒有知識就等於赤手空拳，工人們有了知識就會是強而有力呵！」（『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四二二頁）。

「五一工人紀念節」的傳單是一八九五年在獄中寫就的。如果我們還不知道，這個傳單是那一年寫的，那按其本身就很容易來決定這點。在傳單裏講到工人的國際紀念節，講到工人的國際鬪爭，但其出發點則是當時許多大中心城市底工人狀況及其鬪爭。傳單說明了鬪爭底前途，並直接號召工人去作罷工鬪爭。

傳單是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一日發表的，而在六月彼得堡就有三萬紡織工人罷工。

第二個傳單「告沙皇政府」對罷工作了個總結，並號召工人作進一步的更加深刻的鬪爭。傳單的結語是：「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的罷工不是徒勞無益的。它們對俄國工人有極大的供獻，它們指明了俄國工人應怎樣為自己的利益來進行鬪爭。它們教會了俄國工人去瞭解工人階級底政治狀況和政治需要。」（『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四五八頁）。

一八九七年秋，列寧為工人寫出自己的第二本小冊子「新工廠法」（註一）。這本小冊子也是按

第一本那樣的體裁來寫的。一八九九年又寫了「論工業貸款」和「論罷工」（註二）等小冊子。

寫作這些小冊子的工作就幫助了列寧還更好地來學習寫作和說話，使他的演說和文章成爲羣衆特別親切易懂的東西。

列寧是向誰學習的講通俗話和寫通俗作品呢？是向當時列寧讀過他很多作品的皮薩略夫學的，向契內舍夫斯基學的，但主要的還是向工人學習來的，他一連幾個鐘頭的來同工人們談話，詢問關於廠內他們生活上的一切詳情細節，仔細地傾聽他們偶然道出的意見，聽他們怎樣來提問題，觀測他們的知識水準，他們對某一問題有些什麼不瞭解之處和爲什麼不瞭解。工人們在其對列寧的回憶中敘述了這些談話底內容。

依里奇爲要把自己的意思更加明顯和更好地轉告工人，會作了不少的工作，但同時却對各種庸俗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縮小問題和把問題簡單化的意向表示憤懣。依里奇在「做什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一書中寫道：

「主要的注意力，應把工人提高到革命家的程度，而絕不應定要把革命家降低到「工人羣衆」的程度（如經濟主義者所想的），定要把革命家降低到「中等工人」的程度（如「自由」雜誌所想的——在這一點上「自由」雜誌已昇到了經濟主義「教授法」底第二級）。我並不想否認替工人編製通

（註一）『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三五頁。——譯者註。

（註二）同上，第五七九以及第五九三頁。——譯者註。

俗書籍底必要——尤其是替特別落後的工人編製特別通俗的書籍（自然，祇不應該是庸俗的書籍）底必要。但使我憤懣的，就是常常把教授法牽聯到政治問題與組織問題。你們這些關心「中等工人」的先生們，你們講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組織，你們預先就想一定要像同小孩講話樣的把腰兒彎起來，這實際上倒是侮辱工人了。你們把腰兒直起來講正經的東西吧，你們把教授法交給教書先生，而不要交給政治家和組織家吧」（『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六一至四六二頁）。

依里奇對於那般與工人唧唧呀呀，和以『花言巧語』（見同上）來代替嚴重討論問題的行為，都是極表憤慨的。

在依里奇的講話和文章中工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依里奇，——像一個工人所說那樣，——總是「鄭重」地與他們談話。

列寧經過三年後（一九〇五年六月），又回到他在『作什麼？』一書中所涉及的問題並寫道：「在社會民主黨底政治活動中常常有，而且將來也會有相當的教育成份的：要教育整個僱傭工人階級去執行使全人類脫離一切壓迫而鬪爭的戰士底作用，要經常地教育這個階級底新階層，要善於去對待這個階級中最無知識、最落後、最少接觸我們科學和生活科學的份子，善於同他們交談，善於同他們接近，善於堅定他，耐心地把他們提到社會民主黨人的意識水準，不要把我們的學說變為枯燥的教條，不要只在書本上來作教育，而且還要以參加到無產階級之這一最黑暗、最落後階層底日常生活鬪爭來教育他們。我們重複一遍說，在這個日常活動中是有相當的教育成份的。社會民主黨人如果要忘記了這一活動，就不成其為社會民主黨人。這是正確的。但現在我們常常忘記這樣一點，就是一個

社會民主黨人若把政治任務只歸結為教育，也是——雖然有旁的原因，——不成其為社會民主黨人的。誰想把這種「教育」作成一種特別的口號，把「教育」與「政治」對立，在這個對立上來樹立特別的派別，為這個口號而向羣衆伸冤，反對社會民主黨底「政策」，誰就必然會立即落到武斷宣傳的立場上去」（『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〇八至三〇九頁）。

這只是來闡明前而所說過的話，並確定依里奇對通俗刊物所提出的要求。

一九〇三年，當自發的農民武裝起義開始時，依里奇就寫了一本『告鄉村貧民書』的小冊子，他在那裏向鄉村貧民解釋，工人爲了什麼而鬪爭，爲什麼鄉村貧民應與工人一同前進。

一九〇五年七月，依里奇就寫了一張『三種憲法或三種政體』的著名傳單（『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頁）。傳單上把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三者按其形式，內容與目的來加以比較。這個傳單是明顯化和通俗化底模範，但同時也是嚴重敘述問題底模範，是一鄭重」談話底模範。

按依里奇的意見，共產黨員在急劇轉變關頭，特別應當寫得通俗和講得通俗。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說：

「有很多人，連我也在內，都須時常當衆講演，特別是在士兵面前講演，我想，如果一切問題都從階級觀點上來解釋，那他們就會最不易瞭解我們的立場，就是我們究竟想怎樣來結束這個戰爭，我們究竟認爲怎樣才可結束這個戰爭。在廣大羣衆中有種種誤會和完全不瞭解我們的立場，因此我們在這裏就應當盡可能通俗一些」（『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二四三頁）。

列寧在同一演說中說：「在羣衆面前講演時，要對他們作具體的回答」。要有鮮明的政治思想。「在聯歡中所缺乏的，這就是鮮明的政治思想」（『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二四七頁）。列寧在講到不破壞資本家底統治，就不能實行所提出的和平條件時，曾堅持要把這一思想向羣衆解釋清楚：

「我再重複一遍：對於落後民衆說來，這一真理是要有些足以使沒準備的人們明瞭這一問題的中間環節的。論戰爭的通俗刊物之整個錯誤和全部虛僞就在於，人們迴避了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表示緘默，把問題描畫成這樣，似乎並沒有階級鬭爭，似乎兩個國家的關係原很友善，既然一個國家進攻另一個國家，於是那個國家就來實行自衛。這是庸俗的議論，其中並沒有絲毫的客觀性，祇是有知識的人們故意欺騙人民而已」（『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一六五頁）。

我們來作個總結吧。列寧很重視善於通俗講話和通俗寫作的技能。必須使共產主義成爲羣衆容易瞭解的東西，如同自己的事業一樣。通俗演講和通俗小冊子應有足以激起某種行動的具體目的。通俗演講中所發揮的政治思想，應該是明確、顯著而有意義的。任何的庸俗化、簡單化和脫離客觀性都是不允許的。應準確地按着計劃來敘述問題，幫助聽衆或讀者自己去作結論，而只把這些已爲聽衆和讀者所領悟了的結論總括起來和形成起來。

不要從抽象的議論出發，而要從切近聽衆或讀者，且足以激發他們的事實出發，並逐漸地、依次地來解說這些事實與階級鬭爭中最重要及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問題間的聯系。

列寧就是這樣來教大家通俗地講話和寫作的。

目前，通俗書籍具有特別的意義，階級鬭爭底尖銳化，要求羣衆盡可能明顯地來瞭解情況，來學習瞭解那激發他們的日常生活事實與爲社會主義而鬭爭的基本問題間的聯系。這樣的書籍簡直少得可笑。這樣的書籍是須編製的。要向列寧和羣衆學習寫作通俗的作品。要學習善於寫作通俗作品，努力工作，集體地養成這樣寫作的技能，並在實踐中來檢查其成效。

怎樣來寫羣衆讀的黨的書籍

怎樣來寫通俗小冊子的問題，是有巨大意義的。每個人都知道，要盡可能用簡單的語言來寫，不允許庸俗化。但關於通俗小冊子的結構問題，關於闡明基本題目的方法問題，却是尚欠明顯的。我想來講講這個問題。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底和一九二一年一月間有過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討論過職工會在當時發展階段上的作用問題。列寧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曾以不多的幾句話說明了，要如何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對象、現象和問題，從辯證法底觀點上來研究問題。請看他的這段話吧：

「爲要真正地認識一種對象，就要把握並研究其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因果關係」。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完全做到這點的，但要求全面觀察就可以免於錯誤，免於僵化。這是第一。第二，辯證邏輯要求在事物的發展，「自身運動」（如黑格爾有時所說的那樣）和變化中來觀察對象。拿玻璃杯（註）作例，這不是立刻就可瞭然的，但玻璃杯也並不是始終不變的，特別是玻璃杯的使命，它的用途，它與周圍環境的聯系是變更着的。第三，整個人類的實踐應當作爲真理底尺度，作爲事物與人類

（註）布哈林提出了應如何決定對象的問題，並拿「玻璃杯」這一對象作例。列寧在反駁布哈林時，認爲他對待問題的態度是非辯證法的。——克魯普斯卡婭註。

需要的聯系底實際標準而包括於事物底完全「定義」中去。第四，辯證邏輯教訓我們，——像已經去世的普列諸漢夫繼黑格爾之後所愛說的那樣，——「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這幾句話，乃是列寧多年研究哲學問題的結果。依里奇之研究哲學並不是因為這是一門「很有趣味的科目」，而是因為列寧在哲學中尋找了行動的指南。他在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這個指南，辯證唯物主義使他善於極深刻地去研究現象，善於找出有組織地影響這些現象的道路；辯證法使他能特有的遠見，堅定的觀點，像人們所說那樣，善於「捉牛先抓角」，即善於發現每個問題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東西。

凡想澈底瞭解列寧主義的人，就要以上面所引證的幾行字來武裝自己，分析列寧底許多著作，並考察他發揮問題的方法。

我們來舉個例吧。九十年代關於在俄國是否發展着資本主義的問題發生了爭論。這是決定當時革命活動之全部性質的最現實的問題。於是列寧就着手來寫「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這一巨著。他解決了這個問題，而結論是很顯然的：要沿着組織工人羣衆和提高工人羣衆覺悟底道路行進。

列寧選擇主題總是很合時的：每篇文章，每一著作都對做什麼的問題給予一定的答覆。每部著作，每篇文章都是行動的指南。

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把握得非常具體。他所研究的問題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具體的資本主義，在我們當時落後國家之該時期中的資本主義。具體地提出一切問題是列寧全部著作的特點。

列寧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來觀察資本主義底發展問題，來觀察城鄉資本主義的一切形式和表現。

把一切問題廣泛地提出來，這也是列寧對待問題的特點。列寧是從一切聯系中和因果關係中來觀察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問題的。在沙俄檢查條例還極端猖獗時，公開寫作讀物，常迫使作者不明顯地說出自己的意思，雖然這樣，但依里奇却善於揭露俄國資本主義與不久以前的農奴制度間的聯系，善於把資本主義與一切社會制度和居民的文化水平等聯系起來加以觀察。列寧是在一切聯系中和因果關係中來觀察問題的。這就說明，如果把他在各個不同時期和各個不同發展階段觀察同一問題的情形加以比較，就能察知他是在何種新的聯系下來把握問題，他怎樣每次都按新的方式來提出同一問題了。

依里奇在描寫十九世紀末俄國資本主義發展這幅圖畫時，逕直拿出了無數的實際材料，研究了當時我國資本主義發展各種形式中已有的全部經驗，選擇出了其中最標本的和最爲顯著的形式。列寧極仔細地研究了這些實際材料和全部現有的經驗。爲了確定最重要的東西，他都依據了研究資本主義已很發展國家的經驗，——他研究了全人類在該領域內的經驗，並根據這個經驗而來觀察我們的經驗。末了，他是在問題的發展中來觀察全部問題的。所有這一切就使他能於作出正確的結論，極有說服力量的結論。

我們能否把列寧底這種工作方法應用於像寫通俗小冊子這樣的問題上來呢？

我以爲完全是可以應用的。需要通俗書籍的讀者，特別注意那些涉及他們所關心問題的書籍。我們對這種書籍有興趣，因爲這是與我們極有關係的。『這本書很好，因爲它指明應作些什

麼」。「這本書很明白，因為這是我們每天親眼見到的事情」。

當作者敘述某種思想而不用具體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時，那讀者就寫道：「最好是更詳細地來解釋一下」。如果問題提得很狹隘，那這本書就會沒有興趣。實際材料最令人信服，「這個人真好像到過我們這裏一樣」。通俗書籍的讀者常常也舉出一些類似的事實來。他們極喜歡能作比較材料的事實，把這些材料拿來比較一下，就更能使人信服。從歷史上來考察問題也是使人信服的：「知道過去，就容易瞭解現在」。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內不僅有紅軍兵士的最有興趣的材料，而且還有極多關於通俗小冊子的批評，其中也有關於論列寧的小冊子的批評。對小冊子的許多批評很明顯地說明了，用辯證方法來敘述問題是最能滿足通俗小冊子的讀者的。

在全蘇聯工農通訊員會議上的報告

在我看來，工農通訊員有非常巨大的意義，我想對這個問題講幾句話。在蘇維埃俄國，我們是在新的原則上來建設新的生活，按照新的方式來改組一切。爲要把這點做得很好，就必須準確地知道工農羣衆中所發生的一切。因而工農通訊員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正確地反映現實。

在過去七年中我們頒佈了很多的指令，其中也有個別不甚適當的。但共產黨總是仔細地注視施行這些指令的情形以及工農羣衆對這些指令的反響。由於黨仔細地注意這些問題，所以它得以把不好的指令改正過來。

列寧屢次說，每一指令，如果不適當，那是可以修改的。只是要看見在工農羣衆中對它的反響怎樣。因此工農通訊員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正確地來反映工農羣衆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只有我們準確地知道羣衆的一切情形時，我們才能施行正確的路線。

可以按着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敘述你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每個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都應知道在他周圍的現實生活中，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這點極關重要。過去七年的經驗是會再好不過地幫助通訊員去分析這個問題。最能幫助大家去分析生活環境的，是列寧主義，因爲列寧主義武裝着每個工人通訊員與每個鄉村通訊員去瞭解什麼是重要的，在自己的通訊中首先應當指出的是什

應，爲了改造生活，需要知道些什麼。

正確地反映工農羣衆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那你就是在進行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因爲輿論能教育羣衆。

當有人闡明某個問題或某種雖在羣衆中有過，但還是羣衆所沒有覺察到的現象時，羣衆就開始來仔細注意它周圍所發生的事情，開始來瞭解，究竟要回答什麼樣的現象並怎樣來回答。很好知道工農生活情形的工農通訊員，學習列寧主義，就能向周圍的人們指明，怎樣按共產主義的，正確的態度來對待每個問題。

列寧說：「我們要把共產主義帶進日常生活中去」。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應按共產主義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生活周圍的一切現象，並分別出，什麼是這個生活中的舊殘餘，什麼是能發展成新的形式，並在其基礎上能按照新的樣式來建設我們新生活底萌芽。這個善於對待問題和善於在自己的通訊中反映最重要問題的本領，在教育羣衆方面具有巨大意義的。

弗拉基米基·依里奇在一九一七年以及以後年代中曾屢次說到羣衆的監督問題。他說，社會主義，這是羣衆的生活的創作。羣衆自己應當監督一切。我們看到，七年以來羣衆的這個監督並不常是成功的。這個監督有時很有成效，有時則毫無結果。這是由於羣衆對許多問題還沒有準備好的緣故。羣衆的監督有時失敗，有時做得不完備，但這並不是說，應拋棄這件事情，拒絕羣衆底監督，而代之
以官僚的監督。

同一件事，當我們沒有把它貫徹到底與達到目的時，是要幾次來從頭做起的。

因此現在，當我們已有七年經驗，文化生活已開始繁榮時，我們是能重新開始這件事情，而在這件事情中工農通訊員是能再好不過的來幫助我們的。惡劣現象時常逃脫了工農檢查員底耳目，但常與這些壞現象相接觸和生活在羣衆中的人，却完全是一目瞭然的。可以經過報紙，經過輿論來實現羣衆的監督。工人通訊員和鄉村通訊員依據着工人以及貧農和中農底同情，能如此闡明實際生活，能如此同這生活中的一切非法行爲作鬭爭，使在這個生活中任何黑暗現象和非法行爲都毫無立足的餘地。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能够而且應當剷除生活中的一切黑幕，最終消滅壓迫和剝削而鬭爭。這是他極大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務。沒有這點就不能實現羣衆的監督，這是十分顯然的。

我們知道，我們還有工農檢查院。它進行着巨大的工作，但工農檢查院在其工作中應依據工農羣衆底幫助。沒有他們的幫助，任何實際的監督都是不會有的。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有一次講演中說：「現在我們開始了偉大鬭爭，這個鬭爭還不是很快就會終結的。這是爲把俄羅斯變爲光明的，光明的和健康的俄羅斯的鬭爭。」

同志們，這個鬭爭正在進行着，我想，在這個鬭爭中工農通訊員是會佔着光榮地位的。

羣衆監督與工人通訊員

關於必須要有羣衆的，首先是工人的監督，要對生產和分配，對銀行、工廠等等以及對自己國家實行監督的思想，貫串了列寧論及如何建設新式國家問題的一切文章和演說。

官僚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他們所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監督，是官僚主義的監督。這是一種表面上的，很容易迴避的監督。資本案所要的，正是這樣的監督。

：「一下子粉碎舊的官僚機器，並立即着手建立能逐漸把一切官僚澈底杜絕的新機器，這並不是烏托邦，這是巴黎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無產階級之直接的和迫切的任務」（『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四〇二頁）。

「首先，——列寧寫道，——應由工人組織來實現統計和監督，然後就應由所有全體人民來實現統計和監督」（『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三七四頁）。

列寧說，如果我們想與官僚主義作鬭爭，就應吸收下層羣衆來參加這一工作。

列寧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第二次全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人員大會上的演詞中說：「一個較短時期的經驗就使我們相信：，沒有社會主義的統計和監督時期，那怕是走到共產主義底低級階段都是不可能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九頁）。

我們現在竟忘記了，工農檢查院最初的任務，是工農對國家機關實行監督檢查的一種組織。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時說：「工農檢查院現在還名不其實，還不能使用它，因為先進的工人都上前線了，因為農民羣衆的文化水平還不能去大批提拔工作人員」（『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三頁）。

列寧在同一講演中說：「除吸收工農參加監督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消除官僚主義呢？在區會議上所批評的也都是些瑣碎事情，關於工農檢查院的問題我却完全沒有聽到說及。我沒有聽見某個區吸收了工人和農民來參加這一事業。真正的建設工作，這就是運用批評並使其內容正確」（『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頁）。

列寧關於工人羣衆監督國家機關的問題曾反覆地思索過。他最後幾篇論工農檢查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文章，就是闡明這個問題的。

爲什麼我們關於羣衆監督和工農檢查院的工作仍然作得這樣壞呢？缺乏什麼呢？據依里奇的意見，缺乏文化。要重新教育羣衆。「我們的任務是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要戰勝軍事的和政治的反抗，而且還要戰勝最深刻和最強有力的思想上的反抗」：「要實現在這方面改造羣衆的工作。我們所見到的，羣衆對知識之關心，對共產主義的熱忱，擔保我們在這裏也能成爲勝利者，雖然，可能不像在戰線上那樣的快」（『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五四頁）。

怎樣改造羣衆，怎樣從新教育羣衆，怎樣頑強地和長期地準備羣衆去實現對生產和分配以及對國家機關的監督呢？

要教育羣衆善於「觀察」。

怎樣才能作到這點並怎樣去作呢？

列寧在其「論策略的信」中對這個問題回答說：「要善於將公式去適應實際生活。」（『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一〇二頁）。

「現在必須領會這樣一個毫無爭論的真理，即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和現實底確切事實」：（『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一〇一頁）。

「理論至多只能指出主要的和一般的東西，只接近於把握複雜的生活」（『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卷，第一〇二頁）。

生活是很複雜的，要善於去說明他，要藉闡明工人日常生活細情小節，引起工人去瞭解理論，去瞭解共產主義，要使包括有繁瑣事情和變換無常的日常生活與共產主義間有某種引帶存在。只有時時刻刻都以無產階級思想底光芒去照耀這些細情小事，才能教工人羣衆去「觀察實際生活」和自覺地對待實際生活，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來批評它和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監督。

從上述一切就可以明顯地看到工人通訊員的巨大作用了。

工人通訊員從共產主義觀點上來闡明工人羣衆親切易解的日常生活，這就幫助工人羣衆更好地來瞭解共產主義，教羣衆去「觀察」，批評和實現監督。

（註）此文寫於一九二四年二月。——克魯普斯姪註。

爲要實現這個重大的任務，工人通訊員就應潛心地來學習。他應儘量完善和儘可能深刻地來研究共產主義理論，他應以共產主義眼鏡，——如果以這樣說——來武裝自己，以便經過這副眼鏡仔細地去觀察工人的日常生活。他應善於把握最主要、最標本、最足以代表一切的東西，並套上聯系於無產階級思想的引帶。

工人通訊員底任務，如果按其應有的嚴重程度說來，是極負責，極困難，但同時又是非常重要的，其中還包含有幫助使依靠奇關於真正工人監督的理想實現的任務。

我們要向依里奇學習

有次當我們安葬一個親近的同志時，我忽然看見了這樣一個標語：「領袖死了，但他的事業不死。」這是正確的。

依里奇已逝世四年了，但他貢獻了畢生精力的事業，却活着，擴大着和發展着。

依里奇的思想，言論和事業，在這四年以來已傳播到我國最偏僻的角落，依里奇也就成爲羣衆更親近的人了。

黨員們翻開書本，再三閱讀依里奇文章和演說，來找尋他所焦急問題的回答，找尋進行鬭爭和工作的指南，一尋找果然都找到了。

工農通訊員也能從依里奇那裏找到這樣的指南。

實在講來，依里奇自己就是個模範的工農通訊員。他善於精敏地觀察實際生活，察出旁人漠然放過去了的現象，從工人利益的觀點上來估計一切細小事體，而後他就在自己的文章中來分析他所見聞的一切，並根據這些細小事體來說明大的原則問題。

一八九五年，以列寧爲首的彼得堡的同志想出版一個秘密的報紙——「工人事業」。當時工人運動還剛剛開始。許多工人還沒完全意識到，爲什麼他們的生活不好，還不瞭解他們要與資本家作鬥

爭，還不瞭解他們要與沙皇政權作鬭爭。於是「工人事業」報就應對工人闡明他的實際生活，使其瞭解他所經歷他所看見的一切。依里奇簡直成了個真正的工人通訊員。他到工人中去詳細地詢問了他們的一切生活情形。一個工人在對依里奇的回憶中寫道：有時，他問了極多的問題，追根究底，簡直把你問得個汗流夾背了。

依里奇不僅自己成了一個工人通訊員，同時他還吸引了所有的同志參加這種工作。他們一連幾點鐘地來解說所得到的消息。依里奇會以這個工作來誘導大家，他要求每個人都準確地來傳達事實和檢查事實。許多次須得去找補充消息。結果就形成了某種特殊的工人通訊學校。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在這個工作中怎樣在依里奇的影響下成長起來，學會更爲準確地和更爲仔細地來觀察問題。關於要如何寫作的問題也談得很多。要少講些空話和一般的議論，要多寫事實。

如果依里奇在彼得堡時是個工人通訊員，那他在放逐時就是個農村通訊員了。農民知道他是學過法律的，所以很多人都到他那裏去請教關於訴訟的事情。依里奇給他們提供了很多法律上的意見，並順便詳細地問及每個到他那裏去的農民和農婦的生活和勞動條件。他收集了極豐富的材料。

他住在國外時，也以同樣的方法來注視德國，英國和法國工人底生活：

不久前，因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我又重新來閱讀了依里奇在一九二七年，——從二月到十月奪取政權時的一切講演和論文。其中特別明顯地反映了依里奇那種善於觀察現實的本領。他回國三星期後就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演講，從這演講中可以看到，他從與兵士、工人和礦工的談話中也知道了極多的東西，——他覺察到了旁人所沒覺察到的情形。

讓工農通訊員，在研究依里奇的文章和演說時，對他的工農通訊活動加以注意吧。他們會看到依里奇的那種善於觀察、善於看到新生活底萌芽和正在增長着的力量，善於看到舊制度的壓力和影響的卓越本領。

他們會看到，樂於革命事業，大規模地研究工人運動，知道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就使依里奇能這樣精敏地來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

他們會看到，這種善於觀察的本領，使依里奇成爲能清醒地估計情況（試回憶回憶布列斯特和約吧）而始終不爲響亮辭句所誘惑的人；成爲會去尋找活的力量並組織它們來作鬭爭的人；成爲會依據所見所聞，依據自己觀察所得的材料，使自己的觀點成爲羣衆親切易解的人了。

善於觀察，這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我們大家都應向依里奇學習觀察問題的方法。我們以這種本領武裝自己，就能更好地在新的條件下去實現他的思想。

培養列寧主義者

(在蘇俄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辭)

同志們，三十年前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他那本「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小冊子內，曾以同情的態度從列寧的詩中引證了下列的話：「現在誰來閱讀克羅普斯托克，然而全都讚美他。我們唯願人們少恭維我們一些，而多用一點心來閱讀我們的作品哩。」(註)你看這段話中講到，我們唯願人們少恭維我們一些，而多用一點心來閱讀我們的作品，我想，這對於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也是適宜的。他在說及某個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已對羣衆不發生任何作用，但却擁有榮譽的老革命家時，就常帶種惋惜的口吻使用一個蔑視的字——聖像。列寧說：「還有什麼，這已是聖像了」；在列寧的著作中他也說，所謂聖像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在它面前須得拜叩祈禱，但他却不能對人們發生任何的影響。

不要把列寧變爲聖像。要使你的思想成爲行動的指南。我以爲，這個思想，應是每個想成爲列寧主義者的青年團員的領導思想。

同志們，你們如果想成爲列寧主義者，你們就應學習爲勞動者的解放事業服務，學習爲共產主義的事業服務。

戰前，和平發展的時期，在社會主義組織公開存在的國家中，那裏的社會主義者常認為，只要有黨，訂得有社會主義的報紙，參加會議，就足夠成爲一個黨員。我們當然是不能這樣的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我們是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此時我們已明白地瞭解，個人生活是不能與社會生活分離的。個人生活一與社會生活分裂，遲早會使這個人叛變共產主義事業，這只是在從前時期，也許是不明白的。我們應極力使我們個人的生活與鬭爭的事業，與建設共產主義的事業相聯繫起來。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拋棄個人的生活。共產主義黨——不是教派，因而也不能宣傳這樣的禁慾主義。有次我在一個工廠中聽見一位女工發言，她號召衆女工說：『女工同志們，你們應當記住，你們既然入黨，那你們就應當拋棄丈夫，拋棄兒女』。當然這樣來對待問題是不可以的。問題當然不是要拋棄丈夫和兒女，問題是要把兒女教育成爲共產主義而鬭爭的戰士，要使自己的丈夫也成爲這樣的戰士。要善於把自己的生活與社會生活融合起來。這不是禁慾主義，恰巧相反，正因爲有這種融合，正因爲全體勞動者的公共事業成爲個人的事業，個人的生活就愈形豐富起來。生活已不平淡了，它已具有這樣鮮明而深刻的內容，這樣的生活內容，是市民的家庭生活中所從來不會有過的。我們當前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會把自己的生活去與有益於共產主義的工作，亦即與勞動者爲建設共產主義的鬭爭融合起來。青年們，你們剛才開始建設自己的生活，你們是能做到使個人生活不與社會生活分裂，

(註)「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

卷，第五六頁。)

這樣來建設自己生活的。

同志們，列寧曾寫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他爲製定這個革命理論曾作了極多的工作。提出明顯的目的，深刻瞭解這一目的，決定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這是每個革命者所必需的，因爲他若不明顯地看到應向何處前進並按什麼道路前進，無論他對自己的工作是何樣的熱心，仍常是不免於錯誤的。

爲了善於在自己活動中去區別主要和次要的東西，就必須明白地瞭解目的，明白地看清道路。而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就有這種善於區分主要和次要的本領。在鬭爭期間有時爲要獲得主要的東西，而在次要方面是可讓步的。機會主義者與革命家的區別，就在於前者讓開重要的和基本的東西，忘記目的，拒絕這個目的。我們可以看到，列寧在自己的活動中，是與這種機會主義，這種不善於堅持主要東西和原則立場的現象作鬭爭。還有另一種錯誤：如果一個人不能區分什麼是主要和次要的，他就會爲革命的空談所誘惑。與革命空談作鬭爭，這點也貫串了列寧的全部活動。列寧說：「革命的理論不是教條。」革命理論是行動的指南，是工作的指南。任何時候都應從這個觀點出發來對理論。目前研究革命的理論對我們大家是極爲需要的。蘇聯在經濟的發展方面來講，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因此其中的無產階級包含有許多參差不齊的階層。有在大工業中工作的先進無產者階層，有更爲落後的無產者階層，有手藝業者，在這些各個不同集團中，階級覺悟程度是極不相同的。因此並不是每個無產者所說的話都是無產階級的真理，要善於區別出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因此仔細地研究革命理論對於青年是極爲重要的。

不要盲目地相信一切：每個人都應當有自己的頭腦。不要輕易相信人家的話，而對於一切事件，自己都應澈底思索。這是青年底任務之一，這是想成爲列寧主義者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底任務之一。列寧說，理論給行動以指南。的確，只是因爲他有革命的理論來領導着，所以他才善於來找得要在目前力圖達到的最近目的。

明白地瞭解目的和實現目的的道路，就給革命者以應有的鍛鍊。這種瞭解就鞏固他在進攻時的堅決性，使他在退却時不致於驚惶失措。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在其所著『做什麼？』一小冊子內寫道：『我們應……常常準備應付一切。』我們對革命消沈時期應該有準備，對革命爆發時期也應該有準備。我們『應準備應付一切，從在革命最受「壓迫」時期拯救黨底名譽、威望和傳統起，以至於準備、確定和實行全民武裝起義爲止』（『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四九六至四九七頁）。

如果妥協必不可免，那就要善於妥協。列寧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工人之路』報寫道：『真正革命政黨的任務並不在於，揚言不能實行任何的妥協，而在於，經過一切的妥協，——如果這些妥協是不可避免的話，——都能始終一貫忠實於自己的原則，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自己準備革命並教育人民羣衆在革命中走向勝利的事業』（『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一三二頁）。

當然，實行妥協並不常常都很恰意的。列寧常愛引證契內舍夫斯基的話說：『政治鬭爭並不是遑瓦大街的坦道』。有時是得走彎路的。

列寧是不喜歡空談家和誇大狂的，他要革命者和黨員進行最緊張的工作。不痛快的和平凡的工作常是有的，可是一個革命者是不能拒絕這種工作的，爲革命事業着想，不

儘需要燦爛觸目的工作，同時也需要日常平凡的工作。

列寧在致墨斯尼可夫的信中說：「人們因不相信繁瑣的，迂緩的，困難繁重的工作，就陷入驚惶失措的境地而去尋找輕便的出路……」（『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七四至四七五頁）。

孜孜不倦和毫不灰心地爲實現目的而工作，這就是依里奇底遺囑。

要把自己的生活與爲實現共產主義的工作聯繫起來，用革命的理論來作指南，清醒地正視實際生活，不害怕頑強艱苦的工作，那你們就會成爲列寧主義者。

青年團員同志們，你們的生活正方興未艾，你們正處於巨大的社會演進時期，高舉着列寧的旗幟，與羣衆並肩前進，並在羣衆的前列向着偉大的目的邁進吧。

如何研究列寧主義

(一) 要教人瞭解列寧主義底實質

同志們！研究列寧主義時，最主要的當然不是去記憶細節、準確的名稱、日期、原詞原句等等。要教研究列寧主義的人瞭解列寧。研究列寧著作的主要任務是在瞭解列寧，瞭解列寧主義。

有次，我同弗拉基米爾·依里奇談到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情形。我讀過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工作報告，在其中說到學生們怎樣熱心研究價值論。還說，有一個學生對價值定義爭論了通宵之後，竟在次晨昏頭昏腦地跑到街上抓住一個過路人，就向他問怎樣來下價值的定義。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他說這不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只求定義準確，公式合乎全部科學規則，深入細節，這是不應當的。研究馬克思主義時最主要的，是瞭解馬克思主義底精神，瞭解它的基本思想，善於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實際中去。

(二) 必須認真地來研究馬克思主義

同志們，當我們來確定什麼是列寧主義時，我們就應當說，列寧主義是由列寧加以發展而應用於

新的鬭爭條件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所運用來研究實際環境和影響這個實際環境時的方法，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所以，你如果想在所教課的小組和班次中，使學生可能更好地瞭解列寧主義，那你首先就應使這些學生瞭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方法和馬克思主義對待現實的態度。要指明出，馬克思怎樣瞭解階級鬭爭，他怎樣瞭解社會發展的方向，他怎樣以其理論幫助階級鬭爭底發展，幫助工人階級瞭解歷史在他們面前所提出的任務。因此應當嚴重注意到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其基礎。現代的青年常常是忘記了問題的這方面，在分析目前實際狀況問題時，常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出發，極抽象地來爭論一些細小的枝節，而不從根本上來估計這種現象。老輩人是經過長久追求才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當然知道馬克思主義，但少輩人却是按着另外的途徑走向馬克思主義。少輩人們是逕直在革命鬭爭的火焰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與老輩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是兩樣的。不要忘記這個事實，而要使少輩們瞭解馬克思主義底方法，給他們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宇宙觀，把能幫助他們去分析目前複雜生活的武器來武裝他們。

(三) 研究列寧主義應從何着手呢？

對這件事情應從何着手呢？第一應使學生們有種關於什麼是科學社會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要根據列寧對我們現實生活基本問題的態度來指明出，他是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他的力量之所在。這裏重要的並不在於來確定列寧對一切次要問題的意見，也不在於多多地援引證據，而在於掌握最基本、最主要、最顯著的特徵，而這樣來規定出基本的路線，並澈底地加以研

究。

研究列寧主義，首先就必須注意到列寧研究和估計目前現狀的方法。

列寧總是盡力來確定每一現象在工人階級爲實現最終目的的一般鬭爭中起着何種作用。如果我們想找到影響這些現象的方法，那這樣來估計現象和善於決定現象在一般總鎖鑰中的地位，對我們是極爲重要的。

(四) 要估計到需求

其次，應怎樣進行這種研究呢？我認爲是應當這樣。這裏極爲重要的是要估計到學生的成份，個人的經驗和他的情緒。如果是農民，那重要的就是農民問題，首先就應來研究列寧怎樣對待農民問題。如果這是與鄉村斷絕了關係的產業工人，那就要講無產階級專政和工人階級的作用，一般的講來，從有關工人切身利益的問題作出發。這種善於選擇最爲人們所注意，最與他們個人生活和經驗緊相關連問題的本領，是極重要的。

近來我曾看到幾種專爲農民羣衆寫作的通俗的列寧傳手稿。結果怎樣呢？如在這中間很詳盡地講到了各代表大會上討論的情形，講到了關於孟塞維克的事情等等。但却忘記了一點，忘記講列寧對土地問題的態度。專爲農民寫作的讀物却不講到他們最有興趣的問題，這是多麼巧妙呵！

(五) 要在具體情況中來觀察現象

怎樣研究列寧主義呢？我以為可用這樣的方法：要拿列寧在多年當中對某一問題的態度，並考察他怎樣在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例如拿農民問題來說吧。試考查考查，爲什麼先前提出關於割地和歸還贖款的問題，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公佈的土地法令中，却提出了沒收全部地主的土地並將其轉爲人民所有。試考查考查，在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下同一思想採取了些什麼樣的形式，這對瞭解什麼是列寧主義是極重要的。

同學生們作完這個對他們最爲切身問題觀點進化的分析工作後，我以為就應該找一個當前的實際問題，對於這個當前的具體問題應力求以列寧研究實際問題的方法從各方面來加以闡明。

我以為，這樣來研究列寧的著作是會得到所必須力求的東西，瞭解列寧和列寧作品底精神，雖然這大概不會使人得到能把列寧著作橫流倒背的知識，但我以為，研究列寧主義正應如此。

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連列寧也在內，都是在現象的具體情況下觀察一切現象的。我記起了在本書中的一段話，這本書在當時曾對我們這一代人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那裏曾講道，一切旗幟，在一個時候是革命的旗幟，而在後來却可以成爲反動的旗幟。如果我們來回顧我們過去不久的革命時光，我們就會看到，例如立憲會議，起初就會是個革命的口號，而後來却成爲一個反動的口號了。起初還沒有任何工人政權，沙皇制度還存在，當時，立憲會議這個口號的意思就是要爲自由發展工人階級和使它今後有組織與發展之可能而鬭爭。但在蘇維埃政權下，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後，立憲會議已完全不是它原來的意思了。此時這口號是表示說，蘇維埃的工農革命政權應把政權讓給立憲會議和資產階級，於是，先前的革命口號，此後已是反動的口號了。誰瞭解鬭爭的精神，見到這個鬭爭的最終

目的，而不咬文嚼字，誰就瞭解，像波爾塞維克瞭解的那樣，爲工人階級事業利益着想，立憲會議是應當解散的。

誰脫離現象發展的具體環境來觀察現象，誰就完全不瞭解這點，誰就以爲在這裏有內部的矛盾，然而確定不移的澈底性，革命鬥爭最終目的所要求的澈底性，却正表現在這裏。

善於在事實周圍的具體環境中來觀察事實，是列寧主義的標誌。當然，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觀察問題的方法。但這一方法要善於去執行，而這就是列寧主義所加進到革命策略中的貴重東西，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其次，我們所遇到的每種現象，我們應在其發展中來觀察它。我在參加今天會議以前，翻閱列寧的著作時，剛巧閱讀了一篇論立憲會議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是怎樣來觀察這個問題的呢？他觀察了該立憲會議是怎樣組織起來的，當時一般的局勢怎樣，人民羣衆在選派立憲會議代表時想些什麼，他們當時的覺悟程度怎樣，然後他又考察了該立憲會議今後的行動，於是就得出結論說，將政權轉交立憲會議就等於消滅蘇維埃政權，即是說消滅工農革命的政權。我們看到，列寧是在現象的發展中來觀察現象的，因而也就作出決定策略的正確結論：要解散立憲會議。

(六) 要仔細的研究現實

列寧力求儘可能準確地來確定某種現象真實存在界限之所在，以自己的和同志的經驗來檢查它，然後就來閱讀俄國的和外國的書籍，選擇和尋找類似的現象，進行比較，這樣來揭露出現象底本質和

說明現象是什麼。這種態度可以與藝術家研究事物的態度和比擬。法國作家弗羅別爾在給莫泊桑的信中，同他提供了爲要很藝術地反映現象該如何研究現象的意見。弗羅別爾寫道：比方，你須唯肖唯妙地來描寫某個看門人或馬車夫，那你就要去觀察他一番，並竭力把握住這個馬車夫或這個看門人與其餘看門人和馬車夫的所有特點，那時你就可以用三言兩語來確定他，使其而貌活現於讀者之前。這雖然是藝術創作方面的意見，但我以爲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應當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現象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去考察現象，找出這些現象與那從前在俄國有過以及其他國家裏現在和從前都有的許多類似現象不同的特點來。列寧通常就是這樣的來估計現象的。

這樣，研究現象，確定它的特點，確定它的比重，在現象的具體情況中和現象的發展中來觀察現象，就是列寧主義對待現實的特點所在。



向列寧學習工作方法

1948.11.再版 哈.5001—10000

基本定價：280元